



战争中 行为约束之根源

THE ROOTS OF RESTRAINT IN WAR

本报告以受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委托的独立研究人员所进行的研究为基础，旨在增进该组织对武装部队和武装团体运作方式的了解。本报告并不包含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一线行动中以保密方式所获得的信息。

本出版物第六章使用了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图标库的图标 (经适当调整后使用)，以及Flaticon网站 (网址：www.flaticon.com) 由Freepik制作的图标。

战争中 行为约束之根源

致 谢

本出版物由菲奥娜·特里 (Fiona Terry) 和布莱恩·麦奎因 (Brian McQuinn) 根据安德鲁·贝尔 (Andrew Bell)、弗朗西斯科·古铁雷斯·萨宁 (Francisco Gutiérrez Sanín)、伊万·吉沙瓦 (Yvan Guichaoua)、费尔多乌斯·布莱尔 (Ferdaous Bouhlel)、奥利弗·卡普兰 (Oliver Kaplan) 和纳奥米·彭德尔 (Naomi Pendle) 主导进行的实证研究撰写而成。本杰明·埃克斯坦 (Benjamin Eckstein)、布莱尔·麦奎因和菲奥娜·特里负责实地调研协调工作。

该项目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一个指导委员会负责监督。该委员会主席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法律和政策部主任海伦·德拉姆 (Helen Durham)，成员包括：克努特·德曼 (Knut Dörmann)、迈克尔·戴恩斯 (Michael Dynes)、路易吉·弗拉蒂尼 (Luigi Fratini)、皮埃尔·让蒂勒 (Pierre Gentile)、艾琳·赫伯特 (Irénée Herbet)、多罗西娅·克里米茨 (Dorothea Krimitsas) 和雨果·斯利姆 (Hugo Slim)。

研究规程由吉勒·卡尔博尼耶 (Gilles Carbonnier)、克劳迪亚·西摩 (Claudia Seymour) 和雨果·斯里姆组成的伦理审查委员会批准。澳大利亚士兵调查已通过澳大利亚国防部和退伍军人事务部人力研究伦理委员会的道德审查。特别感谢安格斯·坎贝尔 (Angus Campbell) 中将批准这项研究。

我们向下列人员所提供的帮助、指导和鼓励致以诚挚的感谢：伊丽莎白·让·伍德 (Elisabeth Jean Wood)、海伦·金塞拉 (Helen Kinsella)、伊娃·斯沃博达 (Eva Svoboda)、林赛·卡梅伦 (Lindsey Cameron)、奥利维尔·班格特 (Olivier Bangert)、蒂娜·布费 (Tina Bouffet)、莎拉·格雷 (Sarah Grey)、莎拉·盖尔 (Sarah Gale)、凯文·迈斯特 (Kevin Meister)、卡尔斯·阿兹纳武 (Kars Aznavour)、埃里卡·波茨 (Erica Potts)、保罗·贝克 (Paul Baker)、皮特·埃文斯 (Pete Evans)、弗雷德里科·阿尔门德拉 (Frederico Almendra)、肯·休谟 (Ken Hume)、伊娃卡·克鲁兹-费雷尔 (Evecar Cruz-Ferrer)、帕斯卡·波尔谢 (Pascal Porchet)、伦纳德·布拉兹比 (Leonard Blazeby)、斯蒂芬妮·里德尔 (Stephanie Riddell)、娜塔莉娅·威尔斯 (Natalya Wells)、克里斯托夫·利迪 (Christoph Luedi)、克里斯托夫·哈尼施 (Christoph Harnisch)、弗朗索瓦·施塔姆 (François Stamm)、贝亚特丽斯·厄克斯利 (Béatrice Oechsl)、多尔萨·纳齐米·萨勒曼 (Dorsa Nazemi-Salman)、艾哈迈德·达伍德迪 (Ahmed Al-Dawoody)、让·尼古拉·马蒂 (Jean-Nicolas Marti)、阿巴斯·达耶尔 (Abbas Daiyar)、伊切恩·基亚莫切 (Ihcène Kiamouche)、妮科尔·范·罗伊恩 (Nicole Van Rooijen)、亚兹姆 (AZM)、萨拉·罗哈斯 (Sarah Roxas)、妮科尔·马丁斯-马格 (Nicole Martins-Maag)、文森特·伯纳德 (Vincent Bernard)、托马斯·圣莫里斯 (Thomas Saint-Maurice)、安托万·格兰德 (Antoine Grand)、克里斯蒂娜·格里兹伍德 (Christina Grisewood)、科尔杜拉·德勒格 (Cordula Droege) 以及一直以来对这个项目给予支持的其他人员。

此外，我们还要感谢英国国际发展部为资助该研究所做出的贡献。



目 录

序 言

内容摘要

前 言

第一章：行为约束规范、组织结构以及社会化.....

第二章：一体化国家武装部队.....

第三章：集权式非政府武装团体

第四章：分权式非政府武装团体

第五章：社区嵌入式武装团体.....

第六章：研究意义与接触方法.....

延伸阅读

6

8

11

17

27

37

45

53

63

72

序 言

很荣幸能向读者介绍这项关于战争中行为约束的新研究。这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来自世界各地的著名学者之间跨学科、跨部门合作的成果。它标志着一项重大进展，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在尊重国际人道法原则和规范方面影响士兵和武装人员的各种因素。

顾名思义，这项研究旨在更好地探究行为约束的根源——即促使各类武器携带者在参与武装暴力时遵守某些限制、甚至在激烈战斗中也保持最低限度的人性的各种因素。研究人员对两个国家军队以及几类非政府武装团体文化和实践的深刻见解，揭示了冲突各方行为背后的各种政治、道德和社会经济原因。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是社会化，即规范和规则得到社会认可并在战场得以遵守的过程。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长期以来一直与国家武装部队和非政府武装团体合作，不断努力促进战争规则在战略、作战和战术层面得到尊重。为此，我们与世界各地的高级指挥官、政策制定者和一线武装人员合作，促进将人道规范和人道法纳入其培训和决策过程中。

因此，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传统上采取依赖于现有指挥和控制体系的方法，推动国际人道法在整个指挥链中得到重视与尊重，并且每个作战单位都基本掌握国际人道法规范。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这些规范实现社会化，但并不足以完全实现。该研究表明，更好的做法是了解行为约束文化是如何实现社会化的，不仅要从正式层面、自上而下地进行纵向理解，而且还要从非正式层面、进行横向理解。它为确保国际人道法基本原则融入武装部队和武装团体所有成员的骨髓开辟了新的途径。

当今冲突的特点是武装参与方众多，目标和意识形态各异。另一个趋势就是冲突日益在各个联盟之间进行，几个国家结盟或国家部队与非政府武装团体合作，以实现既定的共同目标。因此，我们更有必要深入了解各方为促进其成员尊重人道规范、实施行为约束所采用的各种不同方式，以及可能存在的外部影响因素。通过增进对这些过程和影响因素的了解，我们能够更有效地与武装冲突各方合作，以确保平民、被拘留者、伤者以及受战争规则保护的其他人员可以根据国际人道法获得人道待遇。

我向参与各研究项目调研、协调和筹资工作的所有人员致以感谢。我希望将他们的重要研究成果介绍给所有致力于进一步约束武装暴力行为的人士。这项研究的新颖见解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军事当局直接相关。它们将帮助我们进一步巩固“行为约束的根源”，我们希望能借此对当今许多旷日持久武装冲突中的行为产生更大影响。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副主席
吉勒·卡尔博尼耶教授

内容摘要

作为国际人道法的权威机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力求确保世界各地的士兵和武装人员了解并尊重旨在约束武装冲突破坏力的规则和规范。本报告将有助于推进这一努力。

本报告以一支杰出学者团队为期两年的研究成果为基础，旨在探究不同武装部队和武装团体中影响武器携带者行为的各种因素。迄今为止，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这一领域的主要工作关注的是国家武装部队，确保国际人道法被纳入其条例和指令、士兵的日常训练以及为遵守规则而制定的纪律机制中。因此，它主要关注国际人道法规定的正式规范。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还与许多非政府武装团体进行了接触，鼓励它们通过行为守则，使其武装人员的行为符合国际人道法规范。但是，武装冲突的性质在过去十年已发生变化，特别是越来越多的非政府武装团体并不具有中央等级结构，因此难以向其成员就国际人道法规则进行传播和培训。这就需要开展新的研究，针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工作中遇到的各类武装团体，探究正式和非正式规范如何影响其行为，以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工作人员如何促进各类武装团体成员实现行为约束。

本报告借鉴了大量力图阐明武装团体行为的实证研究。有两个常量较为突出：第一，武装组织之间和武装组织内部在暴力和行为约束模式以及影响其行为的信念、机制、资源和人员方面存在重大差异；第二，这些差异也可能随时间而发生变化。因此，本报告并未制定新的指令，让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与武装部队和武装团体接触时采用，而是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以协助其工作人员根据武装团体的组织结构对其进行定位归类。本报告还按照这些团体的不同类别，进一步阐述规范是如何得以传播和采用的。本报告还提供了一些可针对具体情形进行调整的方法。

主要结论

1. 在集权式武装部队和武装团体中将国际人道法纳入条例、培训和遵守机制，可以为战场行为施加更多约束。培训的强度和规范的教授方式十分重要，而且应该在压力环境下对规则遵守情况进行检验。
2. 与仅关注法律相比，把法律与其根本价值观结合在一起能够更加有效地影响行为。将法律与地方规范和价值联系起来，使其更具说服力。法律在制定标准方面的作用至关重要，但通过社会化鼓励个人将法律所代表的价值观进行内化，可以更持久地促进行为约束。
3. 了解武装团体的组织结构是探究影响其行为潜在因素的第一步。武装团体权力越分散，影响该团体的外部因素就越多。
4. 通过关注行为约束与暴力，我们可以进一步加深对行为影响方和行为影响因素的理解。分析暴力模式有助于准确找出实施了行为约束的实例。
5. 青年是当今和未来战斗员的主要组成部分。寻找具有创新性并适应当地情况的方法，包括采用数字媒体，在青年中加强人道规范教育至关重要。
6. 外部实体能够影响武装部队和武装团体的行为。将人道组织和当地社区与武装团体的接触定为刑事犯罪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并妨碍促进尊重人道规范的努力。



前言

本出版物以一支杰出学者团队为期两年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2004年的一项研究《战争中行为的根源》¹进行了更新。该研究探讨了在武装冲突中影响士兵和武装人员行为的社会和心理过程，并探究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可以通过何种方法说服他们认识到遵守1949年四个《日内瓦公约》和其他国际人道法文件中所载战争规则的必要性。

《战争中行为的根源》中的研究成果促使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发生了重大政策变化。该组织将工作重点从促进国际人道法变得广为人知，扩大到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确保相关法律框架纳入武装部队和武装团体的内部运作机制。该研究认识到从众效应²和服从权威³在行为调整方面的重要性，建议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鼓励武装部队将国际人道法纳入其条例和训练中，并对违反该法的行为实施制裁。换言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作用是说服武装部队在队伍中明令尊重国际人道法，并在制定相关培训项目和遵守机制方面提供咨询和帮助。

《战争中行为的根源》还建议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将国际人道法教学作为法律和政治问题而不是道德问题，优先考虑法律规范而不是所依据的根本价值观，因为后者会随着冲突爆发原因和方式发生变化。由此产生的政策被称为“纳入法”，并自此指导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开展工作，促进各种武装部队和武装团体遵守国际人道法。

本报告根据冲突和武装团体性质在这十年间的变化，重新审视了《战争中行为的根源》的一些研究结果。本报告也受益于学术界和政策界对武装团体行为问题与日俱增的关注度。⁴

研究目的

这项新研究主要有两个目的。第一，这项研究旨在帮助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深入了解此前研究中探讨的影响行为的一些过程和机制，以寻找最有效的应对方案。本研究特别关注国际人道法培训对行为的影响以及士兵们自己认为最有效的教学方法。对“纳入法”进行了阐述，以评估由法律知识、法律培训或依法处罚的威胁所构成的模式中哪个方面对行为影响最大，以及它与非正式规范（特别是同伴团体从众效应）相比，有何优势。

-
- 1 丹尼尔·穆尼奥斯-罗哈斯 (Daniel Muñoz-Rojas) 和让-雅克·弗雷萨尔 (Jean-Jacques Frésard)，《战争中行为的根源：了解并防止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日内瓦，2009年。
 - 2 Dave Grossman, *On Killing: The Psychological Cost of Learning to Kill in War and Society*,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New York, 1995, updated 2009; Christopher R. Browning, *Ordinary Men: Reserve Police Battalion 101 and the Final Solution in Poland*, HarperCollins, New York, 1992.
 - 3 The seminal work cited being Stanley Milgram's *Obedience to Authority: An Experimental View*, Harper & Row, New York, 1974.
 - 4 See, for example, Hyeran Jo, *Compliant Rebels: Rebel Groups and International Law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2015; *Humanitarian Exchange*, No. 58, July 2013, special issue on humanitarian negotiations; Geneva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nd Human Rights, *Reaction to Norms: Armed Groups and the Protection of Civilians*, Policy Briefing No. 1, Geneva, January 2014; and Geneva Call, "Exploring Criteria & Conditions for Engaging Armed Non-State Actors to Respect Humanitarian Law & Human Rights Law", Conference Report, Geneva, 4-5 June 2007.

第二，本研究包括近年来日益增多的非政府武装团体，他们并没有适合采用“纳入法”的纵向等级组织结构。对于这些横向组织结构的武装团体，我们应如何促进其成员采取行为约束规范？这些团体是否像通常描述的那样各自为政和无组织性？是否存在明显影响其行为的因素？如确实存在，我们应如何加以明确，并对其施加影响？

该报告首先在当今更广泛的政治背景中探讨武装团体行为问题，强调了武装冲突中确保平民安全方面出现的一些新挑战。然后简要说明了本研究的研究方法。第一章概述了行为约束规范的定义、组织结构具有相关性的原因，以及如何通过社会化向武装部队和武装团体成员灌输规范。第二章至第五章介绍了对四种武装团体的实证研究结果，分别探讨了行为约束规范发展的影响因素。第六章汇总了最适用于人道组织工作的研究结果，并提出了一个指导框架，用于分析并反思在试图影响士兵和武装人员行为时应考虑的因素。

武装冲突增加，武装团体增多

过去十年出现的重要新趋势给人道组织带来了深刻的挑战。首先，在过去15年里，世界各地武装冲突数量明显增加。根据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法律分类，从2001年到2016年，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数量增加了一倍多，从不到30次增加到70多次。

“2001年至2016年，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数量增加了一倍多。”

冲突参与方的数量也呈指数增长。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数据显示，如今只有三分之一的冲突发生在两个交战方之间：44%的冲突发生在三至九个敌对势力之间，22%的冲突发生在十多个敌对势力之间。一些冲突有数百个参与方：到2011年10月利比亚战争结束时，仅在米苏拉塔市登记的独立武装团体就多达236个⁵，卡特中心统计2014年有一千多个武装团体参与了叙利亚的战斗⁶。交战方众多导致更加难以了解这些武装团体，难以与其进行接触。

5 Brian McQuinn, *After the Fall: Libya's Evolving Armed Groups*, Small Arms Survey, Geneva, 2012, p. 13.

6 Carter Center, *Syria: Countrywide Conflict Report No. 5*, Carter Center, Atlanta, February 2015.

此外，特殊的暴力形式可能导致倡导在战争中实施行为约束的努力功亏一篑。羞辱、不公正和腐败迫使许多新兵加入自称的圣战组织⁷。由于低成本通讯技术和社交媒体平台迅速发展，这些圣战组织在中东、非洲和亚洲等地不断增多并迅速蔓延。2017年，出现武装冲突的国家中40%都存在圣战组织，目前绝大多数外国干预都是针对具有圣战目的的武装团体。一些圣战组织实施极端的、有时甚至是肆意的暴力行为，促使许多国家颁布严厉的反恐法律，但这些法律有可能损害这些国家声称要保护的自由。几位政界要员宣称希望置伊斯兰国武装人员于死地，而不是对其进行拘留或起诉，这从根本上违背了长期存在的关于被俘或投降战斗员待遇的国际法规则。⁸

越来越多的武装冲突在城市中进行，导致大量平民伤亡和重要基础设施遭到破坏。

越来越多的武装冲突在城市中进行，导致大量平民伤亡、电网和水处理厂等重要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基础设施的互联性意味着一种服务受损将会对其他服务产生连锁反应，并阻碍修复损坏的工作。⁹如在阿勒颇、摩苏尔和拉卡所见，在人口稠密地区使用具有大范围杀伤效果的爆炸性武器更有可能造成滥杀滥伤效果，对平民带来毁灭性后果。

最后，几个强国正日益将战争外包给代理人和技术“代理”¹⁰，目的是与战场保持一定距离，并降低直接参与战争的国内成本。这可能包括向交战方提供后勤、培训、情报、咨询、空中或其他形式的支持。虽然这种支持一般针对国家武装部队，但也可针对私营安保公司、非政府武装团体、民兵和遵照国家命令工作的社区警卫人员。网络战、监视和战斗无人机等远程技术的日益广泛使用，以及自主武器系统的发展使得作战人员更加远离一线战场。国家支持方试图利用人力和技术“外包”来减轻对战场行为负有的责任，故意避免为其伙伴的行为承担责任（尽管它们有法律义务确保尊重国际人道法），同时此类代理人的使用以及无人机操作员与其攻击目标的分离，更容易导致对敌方丧失人道考量。

7 见斯科特·阿特兰 (Scott Atran) 的著作，他对促使武装人员加入这些团体的有关因素进行了广泛研究。另见奥利维埃·罗伊 (Olivier Roy) 与吉勒·凯佩尔 (Gilles Kepel) 关于圣战的发展是激进主义伊斯兰化还是伊斯兰激进化的辩论。简要概览见：Adam Nossiter, “‘That Ignoramus’: 2 French Scholars of Radical Islam Turn Bitter Rivals”, *The New York Times*, 12 July 2016.

8 See Anne Barnard, “Red Cross warns of ‘dehumanizing’ rhetoric in ISIS fight”, *New York Times*, 26 October 2017. Unfortunately such statements persist; see Jessica Elgot: “British Isis fighters should be hunted down and killed, says defence secretary”, *The Guardian*, 8 December 2017.

9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旷日持久的武装冲突期间的城市服务：呼吁采取更佳方法援助受影响人群》，日内瓦，2017年。

10 Andreas Krieg and Jean-Marc Rickli, “Surrogate warfare: The art of war in the 21st century?”, *Defence Studies*, January 2018, pp. 113–130.

正如亚历克斯·列文豪斯 (Alex Leveringhaus) 最近在博客中所说“采用新型增强远程作战能力的技术远非开创一个更加人道的战争时代，事实上，反而可能会削弱限制暴力的非正式规范的作用。”¹¹

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确定四类武装团体中影响行为约束规范发展的因素，其中两类武装团体是集权式组织结构，另两类是更扁平化的横向组织结构。针对每种类型，均重点研究了两个武装部队或武装团体，共八个研究对象。根据国际人道法的法律分类标准，所研究的团体不一定是武装冲突参与方。

第二章总结了由安德鲁·贝尔分别与409名澳大利亚部队官兵和1030名菲律宾部队官兵进行的定量和定性研究。通过采访以及假设情景下的实验性调查，该研究阐明了影响战斗员观点的不同因素的相对重要性。这项研究是首个就国际人道法、作战伦理和冲突期间针对平民的行为等问题对国家武装部队现役战斗员进行的调查，为国家武装部队的社会化机制提供了独到见解。

第三章介绍了由弗朗西斯科·古铁雷斯·萨宁在哥伦比亚对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EP)和哥伦比亚民族解放军(ELN)的暴力和行为约束模式进行研究所得出的结论。这项研究的基础是暴力侵害平民数据库“受害者记录”(Registro Único de Víctimas)的大量数据，¹²并以对退役和现役战斗员、受害者和社会实体的115次采访作为补充，阐明了武装团体组织结构和意识形态在行为方面的作用。

第四章探讨了影响马里北部两个圣战组织的各种因素，这两个组织分别是活跃于基达尔地区 (Kidal) 的“伊斯兰卫士组织 (Ansar Dine)”和加奥地区 (Gao) 的“西非圣战统一运动 (the Movement for Unicity and Jihad in West Africa, MUJAO)”。伊万·吉沙瓦和费尔多乌斯·布莱尔研究了这两个组织在争夺权力时期和统治各自地区时期在行为和影响因素方面的变化。数据来源包括演讲和无线电广播、官方文件和这些组织发表的声明，以及对与这些组织关系密切以及亲身观察其行为的人员进行的采访。

最后，第五章着重研究南苏丹西南部丁卡族社区 (原湖泊州) 的格尔文 (gelweng) 游牧武装团体、西北部丁卡族社区 (原瓦拉普州) 的蒂特文 (titweng) 游牧武装团体和西部努尔社区 (原团结州) 的戈贾姆 (gojam) 游牧武装团体。这项研究由纳奥米·彭德尔在2016年7月到2017年8月间负责开展，该研究以其团队于2009年至2015年间在该国进行的人种志研究为基础。数据来源包括对游牧人员及其家人、社区领袖、政界人员、精神领袖和社区成员的访谈，以及对新闻文章和游牧歌曲内容的分析作为补充。

¹¹ Alex Leveringhaus, “Autonomous weapons mini-series: Distance, weapons technology and humanity in armed conflict”, *Humanitarian Law & Policy* (blog), 6 October 2017.

¹² <https://www.unidadvictimas.gov.co/>



第一章

行为约束规范、 组织结构以及 社会化

本章概述了何为行为约束规范，组织结构为何重要，以及这些规范如何通过社会化过程灌输给武装部队和武装团体。

1. 行为约束规范

本报告探讨行为约束，此处定义为主观限制暴力使用的行为。大多数研究武装冲突的学者，以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等组织，都倾向于侧重记录和了解武器携带者过度使用暴力的行为，特别是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¹³当今较为常见的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包括攻击非战斗员、不成比例的攻击、使用不分皂白的武器、强迫流离失所、性暴力以及对医疗设施和人员的攻击。但是，后文提及的几位学者在过去十年的工作表明，扩大研究范围以找出实施行为约束的实例或模式是大有裨益的。如果在特定冲突中针对平民实施的暴力频率或类型有所减少，或开始尊重此前无视的受国际人道法保护的标志、建筑物或人员，都有助于阐明行为约束的来源，以及先前未知的行为影响因素。如果武装人员在某种情形下实施了行为约束而在另一种情形未实施，也可以说明指挥官的控制程度。例如，科多克镇于2017年遭到暴力袭击，但科多克医院却幸免于难（见方框）。

科多克医院幸免于难：行为约束实例

2017年4月，在南苏丹科多克三个武装参与方之间爆发的冲突中，除了医院，整个城镇都被洗劫一空。过去四年来，该国深受暴力影响，其特点是医疗设施遭到抢劫和破坏，而这个行为约束实例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获知战斗可能会蔓延至该镇后，对医院工作人员和病患进行了疏散，并锁上了木门。出人意料的是，他们回来后发现，只有医院大楼外面的物品被洗劫一空，而挂锁仍完好无损。

这种体现了行为约束的情况有助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思考可能的促成因素。该组织此前已向每个指挥机构的各级联系人发送了实时信息，要求“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尊重科多克的医务人员和医疗设施”。能够提出不对科多克医院进行攻击这一具体要求，完全得益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该国武装部队和武装团体各层级就遵守人道准则的重要性所进行的长期广泛对话。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提前收到撤离城镇的警报，证明该组织与各方都成功地建立了信任。但即便如此，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位于科多克的办公区还是遭到抢劫，而同样的方法也未能阻止其他医院遭受袭击，这表明还有其他因素在发挥作用。通过进一步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希望保留人口就地安置是下令不对医院予以攻击的主要因素。

¹³ See, for example, Stathis N. Kalyvas, *The Logic of Violence in Civil Wa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2006; Hugo Slim, *Killing Civilians: Method, Madness and Morality in War*,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2008, reprinted 2010; Benjamin A. Valentino, “Why we kill: The political science of political violence against civilian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17, May 2014, pp. 89–103.

这一案例表明，南苏丹指挥官对暴力强度和攻击目标的控制有时高于其声称的程度，因此或许可以在防止违法行为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对于行为约束这一概念，存在多种解读方式。¹⁴斯科特·斯特劳斯 (Scott Straus) 在分析为何卢旺达的暴力局势会升级为种族灭绝，而科特迪瓦却没有时，指出了促成局势缓和与行为约束的原因。¹⁵通过比较历史上巴以冲突的暴力模式，詹姆斯·罗恩 (James Ron) 提出了“野蛮行为之约束”的概念，即鉴于以往经验，本可能出现最为恶劣的行为，但最后得以避免。¹⁶伊丽莎白·伍德探讨了为何斯里兰卡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的武装人员针对平民居民实施了各种极端暴力行为，但却很少实施性暴力。¹⁷在每一项研究中，行为约束按照不同基准予以衡量：与类似案件进行比较；与过去行为进行比较；与其他暴力形式进行比较。

本报告根据国际人道法规定的标准对行为约束进行衡量。对相同局势下活动的各个武装团体及其历史暴力模式进行比较，也有助于密切关注这些团体对待平民方面的改善情况。真正的行为约束不应与机械因素造成的行为约束相混淆：例如，攻击减少的原因也可能是武装分子大量逃离、武器供应中断或季节性天气。此外，比较各武装团体在暴力与约束方面的差异，也需将规模、能力和地形差异纳入考量。

虽然本报告使用国际人道法规范作为衡量行为约束的基准，但在反叛乱战争中，行为约束的概念更为严格，被称为“勇敢约束”。它承认虽然在国际人道法下一些平民伤亡可能是合法的，但造成这种伤亡会破坏军事行动的目的，并导致平民更加支持叛乱分子。阿富汗的经验证据证实了这一假设，发现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对平民造成的伤害致使平民更加支持塔利班，而塔利班对平民造成的伤害并没有增加平民对国际安全援助部队的支持。¹⁸

识别出真正实施了行为约束的情况是颇具挑战性的，因为它本质上是在证明与事实相反的情况，即本来可能会发生但并未发生的事情。弗朗西斯科·古铁雷斯·萨宁和伊丽莎白·伍德制定了一个跟踪暴力模式的框架，可能有助于开展这项工作。¹⁹

¹⁴ 我们对弗朗西斯科·古铁雷斯·萨宁就此问题进行的大量讨论表示感谢。

¹⁵ Scott Straus, “Retreating from the brink: Theorizing mass violence and the dynamics of restraint”,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 10, No. 2, June 2012, pp. 343–362.

¹⁶ James Ron, “Savage restraint: Israel, Palestine and the dialectics of legal repression”, *Social Problems*, Vol. 47, No. 4, November 2000, pp. 445–472.

¹⁷ Elisabeth J. Wood, “Armed groups and sexual violence: When is wartime rape rare?”, *Politics & Society*, Vol. 37, No. 1, March 2009, pp. 131–161.

¹⁸ Jason Lyall, Graeme Blair and Kosuke Imai, “Explaining support for combatants during war-time: A survey experiment in Afghanista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07, No. 4, November 2013, pp. 679–705.

¹⁹ Francisco Gutiérrez Sanín and Elisabeth J. Wood, “What should we mean by ‘pattern of political violence’? Repertoire, targeting, frequency, and technique”,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 15, No. 1, March 2017, pp. 20–41.

暴力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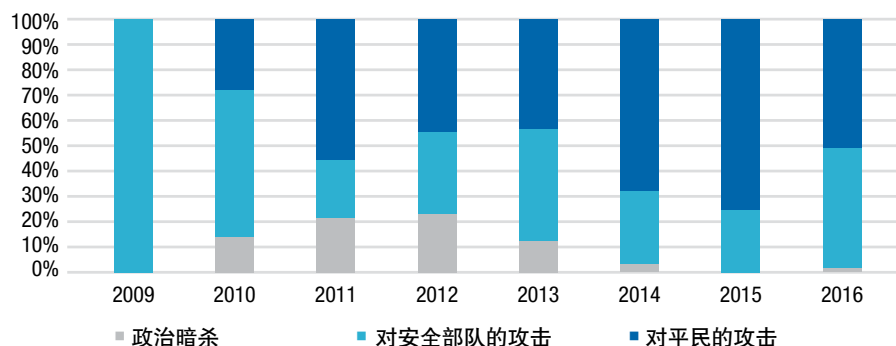
记录和分析某一武装冲突的暴力模式有助于深入了解该暴力局势并识别出实施了行为约束的实例。暴力模式的构成包括经常使用的暴力类型(如杀戮或强迫流离失所),以及所知的每种暴力类型的攻击目标(谁)、频率(多久一次)和使用的的手段或方法(例如,用砍刀杀人或烧毁房屋以驱逐居民)。例如,伊斯兰国占领伊拉克北部一些地区后,使用的暴力类型包括通过性奴役(手段)对雅兹迪妇女和女孩(目标)多次(频率)实施性暴力(类型)。²⁰总体暴力模式还可进一步划分为子模式,由两个变量构成(如频率与对象,或类型与手段),有助于详细了解某团体实施暴力背后的意识形态或理由。

分析暴力模式在三个方面有助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开展一线工作。首先,它可以指出武装团体的行为随时间推移而发生的变化。这有助于精确查明实施了行为约束的时期,即暴力类型或攻击目标范围有所缩小或总体使用暴力的情况有所减少的一段时期。这又能反过来帮助我们研究并追溯行为变化的可能原因,以及可能对行为产生影响的因素。例如,哥伦比亚冲突中有一段时期,民族解放军由于受到来自环保主义者的压力而停止炸毁输油管道,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确定“行为影响方”时通常不会考虑到环保主义者。

随着时间的推移,追踪一个武装团体的暴力模式也有助于预测可能出现暴力和行为约束。杰茜卡·斯坦顿(Jessica Stanton)通过记录圣主抵抗军在1994年至2003年间实施的暴力行为,发现该组织在与乌干达政府进行和平谈判期间,暴力程度有所缓和,但在七次调解尝试失败后,每次该组织实施的暴力都会变本加厉。²¹能够预测何时会出现暴力和行为约束,就可以指导开展预防性和补救性的应对工作。

对武装团体暴力模式的可靠记录也可提高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各方领导层进行对话时所提供建议的说服力(假设可以开展此类对话)。例如,在与“阿萨斯逊纳盖达瓦圣地(JASDJ-aka Boko Haram)”组织的对话中,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将能够证明,该组织的战术在2009年至2016年间从仅攻击军事目标逐渐转变为攻击不属于安全部队的目标(见图一)。

图1：2009年至2016年“阿萨斯逊纳盖达瓦圣地组织”暴力行为的攻击目标²²



²⁰ Mara Revkin and Elisabeth J. Wood, “The Islamic State’s pattern of violence: Ideology and institutions, policies and practic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San Francisco, 31 August–3 September 2017.

²¹ Jessica A. Stanton, *Violence and Restraint in Civil War: Civilian Targeting in the Shadow of International La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2016, p. 261.

²² 我们感谢纳撒尼尔·艾伦(Nathaniel Allen)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尼日利亚社会暴力项目的数据,作出了这项分析。

第二，分析暴力模式有助于对相同局势下开展活动的不同团体进行比较，以进一步了解影响武装团体行为的机制和因素。例如（见第四章），通过比较控制马里领土的两个伊斯兰团体暴力模式的异同，我们发现尽管两者拥护同样的伊斯兰教义，但一个团体所从事的暴力活动内容比另一个团体要广泛得多，包括自杀式爆炸袭击、绑架外国人，以及对其他非政府团体和政府实施攻击。

第三，分析武装部队或武装团体内部各单位层级的暴力模式，有助于分清实施暴力是“政策”命令所致还是姑息纵容所致，伍德将后者称为“惯例行为”。²³这个重要的区分可以指导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适当的领导层开展干预工作。正如第三章所表明的，如果武装团体内部的下级单位实施了未经领导层批准的机会性的暴力，最好针对副指挥官和部队层级进行干预工作。

通过社交媒体衡量影响力

为撰写此报告，我们对社交媒体的大数据能否帮助识别具有影响力的个人进行了研究，特别是通过他们的帖子的内容和分享的程度。

这项研究的重点是推特，在固定时间段内使用关键词来查找提及“约束指令”的情况，该指令是什叶派领袖西斯塔尼 (Ayatollah al-Sistan) 于2015年初发布的，以应对“全民动员组织” (Popular Mobilization Units) 在摩苏尔打击伊斯兰国组织时实施了虐待行为的指控。他提出的“对战场上战士的忠告和指导”具体规定了伊斯兰法律和传统所不允许的行为，其中大部分符合国际人道法的重要内容，包括尊重非战斗员和死者神圣不可侵犯。

西斯塔尼是伊拉克最有影响力的什叶派领袖，但他的“约束指令”的重要性并没有反映在我们所能接触到的社交媒体内容上。这一发现表明在这种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来衡量影响力的局限性。

2. 组织结构为何重要

武装团体的组织结构是决定其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该结构受几个因素影响，包括意识形态和条令条例；领导行为取向；招募策略；资金来源；团体历史；以及既存社交网络。组织结构还受外部因素影响，如敌对方的实力和效率、团体运作环境的地形，而最重要的是外部政治或军事支持。获得邻国庇护的武装团体采取的组织形式可能完全不同于未得到庇护的组织。

²³ Elisabeth J. Wood, “Rape as a practice of war: Towards a typology of political violence”, *Politics and Society* (forthcoming); Amelia Hoover Green, “The commander’s dilemma: Creating and controlling armed group violenc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53, No. 5, September 2016, pp. 619–632.

尽管存在这些可变因素，但武装团体若希望长期存续，仍须满足一些基本条件。这包括：1) 可靠的武装人员——需要招募；2) 食物和弹药的常规供应——需要资金和后勤；以及3) 对团体成员具有控制力，使他们遵守命令，不背叛领导者——需要军事纪律和(或)对组织忠诚。团体应对这些挑战的方式决定其组织结构，有严格遵循自上而下军事纪律的集权等级组织，也有权力极为分化的、在没有暴力冲突时可回归社区的非集权组织。组织结构影响着军事能力、领导者实施的控制类型以及战斗员如何从不端行为中学会践行正当行为。虽然组织结构受多种因素影响，但最具决定性的因素是如何满足三个基本需求(招募、资源和控制)。

招募新成员并向其灌输团体规范对于该团体的存续至关重要。杰里米·温斯坦(Jeremy Weinstein)的研究表明，虽然加入武装团体的理由各不相同，但获得资源的机会可以极大影响武装团体所吸引的新兵类型，这继而又影响了武装人员与社区之间的关系。²⁴钻石或钶钽铁矿石等资源吸引机会主义者，这些武装人员不需要社区支持，因此会更加恶劣地对待社区成员。相反，在资源贫乏的情况下，武装人员需依靠当地民众，因而激励其更好地对待社区成员。

维持一个武装团体的成本很高，每年要花费高达数百万美元。²⁵为充分利用某个特定收入来源，武装团体需要以特定的方式进行组织。这会影​​响领导者实施控制的类型以及该团体使用暴力的倾向。例如，革命联合阵线(联阵)为了在塞拉利昂开采钻石，只需控制几个矿井和几百名武装人员。这就要求该团体高度军事化并采取暴力手段(以保护矿井)，(为防止钻石被盗)对行动实施监督时无需复杂的等级体系。相比之下，在世界上最贫穷、最闭塞的国家之一尼泊尔，毛主义叛乱团体通过向当地社区和企业征税来获取收入。这就要求该组织规模庞大且纪律严明。与联阵不同，毛主义叛乱团体以纪律严明并严守行为守则著称。在这两个实例中，团体寻求资源的具体战略影响了他们的组织结构和暴力倾向或行为约束倾向。

对武装团体的存续以及军事活动的成效而言，保持控制权或武装人员的忠诚也至关重要。²⁶武装组织一般以连队规模的武装人员(少于150名)组成。同样的作战经历让成员团结在一起，形成比家庭纽带还要牢固的联系。对于分权式团体而言，这种凝聚力是主要粘合剂，将各个组成部分团结在一起。各个组成部分又由其领导者相互连接，在联盟发生改变时也能保持团结。集权式军事结构通过培养对组织和单位的忠诚度来建立凝聚力。这需要根据团体历程和集体仪式来建立一种身份。高度集权的国家部队由民族主义理想凝聚在一起，并充分利用各连队的团体历史。在集权式非政府武装团体中，意识形态发挥这一作用。然而，最重要的并非思想或价值观的具体内容，而是它们能够转化为实践，创造出完全沉浸式的体验，并使该团体整齐划一。

24 Jeremy M. Weinstein, *Inside Rebellion: The Politics of Insurgent Viole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2007.

25 Achim Wennmann, "Grasping the financing and mobilization cost of armed groups: A new perspective on conflict dynamics",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Vol. 30, No. 2, 2009, pp. 265–2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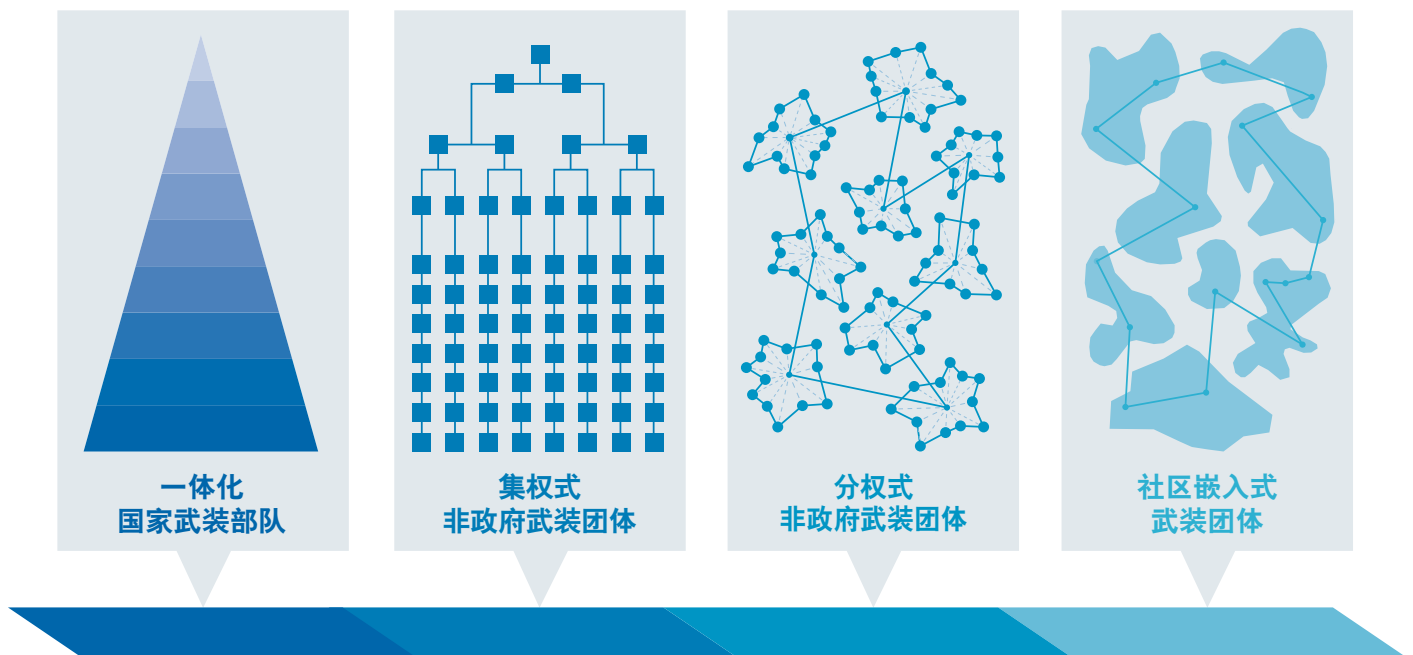
26 Guy L. Siebold, "Key questions and challenges to the standard model of military group cohesion", *Armed Forces & Society*, Vol. 37, No. 3, June 2011, pp. 448–468.

理解组织结构对人道组织来说具有两方面意义。首先，它有助于确定一个组织内的关键决策者。在分权式团体中，每个下级指挥官对该单位的行动和行为具有重大掌控权。因此，地方指挥官是讨论其下属成员行为的关键联系人。在集权式武装团体中，下级指挥官必须服从命令，因此高级领导者是中央决策者，是解决行动和人道问题的主要联系人。然而，如果监督体系薄弱也可能会影响监管效果，给予下级指挥官更多解读中央指令的空间，因此也有必要在下级指挥官一级建立对话。

第二，组织结构可以体现领导者可使用的实施影响力的手段。集权式武装团体依靠明确的规则和价值观，而这些规则和价值观可能会通过教导和训练传授给基层武装人员。分权式和社区嵌入式武装团体可能并不制定书面行为守则，而是依靠共同价值观和传统来行事。因此，需要在社区内部确定影响规范的行为源自何处，而其源头可能并非显而易见，外部人员可能无法知晓。

在本报告中，各类武装部队和武装团体在一个组织类型范围图上得以体现，从高度集权式国家军队到分权式武装团体，有些分权式武装团体缺乏组织结构和负责的指挥体系，所以并不属于国际人道法意义上的武装团体。(见图二)。因此，从法律意义上讲，后者不能成为武装冲突的一方。

图二：武装团体组织类型范围图



某团体在组织类型范围上属于哪一类是由四个标准决定的：权威的中心和类型；等级体系的性质；纪律的性质；社会隔离度。使用外显指标来确定每项标准的可比值(见表一)。

表一：武装团体的内部结构

特征	指标	集权式	分权式	嵌入式
权威的 中心和类型	行动指挥权	高层领导者	下级指挥官	团体内外各方官员进行协商
	决策方式	自上而下	下级指挥官达成共识	拥有关键影响力者进行共同决策
	权威的性质	官僚色彩浓厚 (体现在所有互动中, 如敬礼)	个人魅力, 官僚色彩不浓厚	个人魅力
等级体系的 性质	组织内部的层级	层级完善 (9-17级)	层级有限 (5-8级)	层级扁平 (1-4级)
	组织内级别使用的一致性	高度一致	一致性有限	不一致
	晋升管理	管理严格	非正式	非正式且不固定
	军事协作水平	水平较高	水平有限	水平较低
纪律的 性质	可遵守的规则	有明确迹象表明存在军事纪律; 日常安排严格; 内部军事司法机制	几乎没有迹象表明存在军事纪律、日常安排受到管理或存在内部机制	没有迹象表明存在军事纪律
	规则编纂	存在明文规则并得到参考引用	存在一些成文规则	不成文规则, 经口头传播
	规则适用的一致性	组织内部具有一致性	不具有 consistency	团体内部不具有 consistency
社会隔离度	与团体外人员的接触	严格管控; 离开营房或营地需获得明确许可	可以进行一些接触	植根于社会结构中 (仍是社区成员)

确定武装团体属于哪一类型, 有助于理解其运作方式, 不过运作方式也会随着时间而改变。例如, 哥伦比亚的民族解放军经历了内部大清洗, 并且几乎完全被政府军打败, 这导致其行为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见第三章), 从高度集权式的武装团体变为相对分权的团体。

当今许多非政府武装团体虽看似是一个统一的战斗力量, 但实际上却是由不同团体所组成的联盟。这些组织尽管具有共同特征或相近的名称, 但其组织形式却可能完全不同。基地组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它成立于1988年, 现在由四十多个不同团体组成, 每个团体都有自己的组织结构和历史。总的来说, 他们作为一个具有共同身份和意识形态的运动来运作, 但在暴力模式和对外部实体的行为取向上却表现出明显差异。这类运动具有一个集权核心, 对一些分权式小团体行使的掌控权不断变化。

像所有类型学一样, 这种类型范围划分方式也有其局限性。线性模型难以面面俱到。例如, 分权式团体可能具有集权式结构特征, 但仍以联盟形式运作。相反, 高度集权的武装团体可能会允许其成员与社会保持经常性接触, 在其组织模型中保留分权式特点。在索马里, 青年党 (al Shabab) 的组织核心权力集中、纪律严明, 但各组成部分成员又拥有强烈的氏族忠诚感, 这种矛盾影响着该团体的指挥和控制。因此, 该类型范围图仅仅是分析武装团体的起点, 并不能取代对其特殊性进行的详细情境化研究。

3. 社会化

为了解行为约束规范如何在武装团体中发展和传播，该报告探讨了社会化，即人们采用特定社区的规范和规则的过程。²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过去的工作重点一直是武装部队和武装团体的正式社会化机制，尽量确保国际人道法规则为所有团体成员所知，被纳入实际培训中，并且如有所违反则会面临处罚的威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非正式规范的关注较少，但即使在高度专业化的国家武装部队中，非正式规范也可以与正式规范发挥同样重要的作用。正如第二章将提到的，尽管澳大利亚和美国武装部队一直努力根除欺凌和性虐待现象，此类行为仍然持续存在。众所周知，在军事和警察部队中，由上级长官向新兵介绍正式规范，然后再经过实际行动学习如何解读这些规范。官方组织规范在同级层面得到的支持或实施越多，就越有可能实现内化。

已知的三种社会化类型值得我们在此探讨。²⁸第一类（类型0）不涉及规范的内化，只是在作出重大奖惩决定之后暂时采用规范。另外两种类型包括不同程度的内化：学习并遵循规范以符合团体期望和行为（类型1）；以及完全内化规范，使其成为个体身份的一部分，成为“正确的做法”（类型2）。

社会化是一个过程，个体会因社会环境影响而实施暴力或表现克制。但暴力本身也可以是一种社会化机制，这一点在被非政府武装团体强制招募的武装人员之中最为明显，他们被迫采取会破坏家庭或社区关系、并与武装团体形成新联系的行为。达拉·凯·科恩 (Dara Kay Cohen) 阐述了轮奸是如何发挥这一作用的，在强制招募的人员中建立忠诚和尊重的纽带。²⁹

这项研究表明，在寻找促进士兵和武装人员实施行为约束的方法时，考虑社会化机制十分重要（此处的“行为约束”按国际人道法规定来解释）。

“战争中行为的根源”研究不仅帮助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提高了对国际人道法的认识，还促进将该法纳入各级武装部队和具有纵向组织结构的武装团体。本研究更进一步，主张与一体化国家武装部队及其伙伴、非政府武装团体（集权式、分权式或嵌入式）开展创造性合作，使士兵和武装人员社会化，对平民实施有约束的行为。



²⁷ See Jeffrey T. Checkel, “Socialization and violence: Introduction and framework”,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54, No. 5, September 2017, pp. 592–605. 该期社会化与暴力特刊包含九篇有关此主题的优秀实证研究文章。

²⁸ *Ibid.*

²⁹ Dara Kay Cohen, “The ties that bind: How armed groups use violence to socialize fighter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54, No. 5, September 2017, pp. 701–714.



第二章

一体化 国家武装部队



- 等级严格的决策和权力体系
- 一致适用的明文规则
- 明显的纪律标志 (制服、敬礼、例行工作等具有专业性)
- 执行任务时与平民生活相分离

并非所有国家军队都是高度集权的。有些可能是以集权结构为模型，穿着带有徽章的制服，并体现出一定纪律性。但是，由于士兵对部族或族群的忠诚或工资支付不定期等原因，领导层对普通士兵的影响力较弱，这会使一些国家军队偏向组织结构类型范围图的右侧，其行为影响因素和社会化方法更接近于分权式武装团体。

2.2 正式社会化过程

实证研究表明，经过训练，战场行为可以得到进一步约束。³⁰但并非任何训练都能达到此种效果。安德鲁·贝尔发现关键是训练强度：有关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冲突数据表明，由受过行为约束规范强化训练的军官指挥的美国部队，对平民实施的暴力行为较少，在对作战领导力因素进行控制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对澳大利亚和菲律宾部队进行的研究同样表明，国际人道法培训程度越深，战斗员就越能更好地遵守行为约束规范。

然而，训练强度只是影响因素之一。澳大利亚和菲律宾部队的实例表明，结合国际人道法简报、课堂讨论、案例研究综述和实地演习的混合训练方法，是向战斗员灌输行为约束规范的最有效方法。³¹澳大利亚军队皇家军事学院最近发现了在压力环境中测试道德合规情况的重要性。在为期一周的培训活动中，学员被剥夺睡眠和食物，教官试图使学员们模仿不道德和非法行为。许多学员默许实施了这些行为，表明疲劳和压力会导致道德崩溃。学员们在教室里听相关匿名录音回放时，他们自己也感到震惊，并表示这一经历比任何其他经历都更能教会他们在面对战场压力之前，必须建立起强有力的道德准则。根据这一经验，皇家军事学院此后启动了一个强化示范道德培训项目，其中包括在压力环境中开展训练，因为经证实这种方法可以极大促进军校学员遵守行为约束规范。

研究还表明，信息传递者也会影响社会化过程。对于澳大利亚和菲律宾士兵来说，有效的国际人道法培训人员需要凭借作战经验建立可信度：他们需要能够利用自身曾面临的困境，解释自己所做的选择。不过，有些战斗员可能会更加信任没有战斗经验但公认拥有国际人道法专业知识的人员：在菲律宾，初级士兵很推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平民律师开展的培训。然而，也许对国际人道法培训工作不利的是，澳大利亚和菲律宾士兵普遍对军事法律官员开展的培训评价很低，认为这些官员是没有直接战斗经验的高层总务人员。此类研究从根本上表明需要了解组织背景，以便确定武装部队中最有效的培训提供者。

相关研究表明，巩固行为约束规范的关键节点包括部署前培训，而最重要的节点是战友伤亡事件发生之后。军事专家大卫·基尔卡伦 (David Kilcullen) 建议，此类事件发生后，部队领导应尽快重申约束规范，因为由军队心理学家主导的行动情况汇报并不会产生同样的效果。³²必须在基层官兵间开展深化行为约束规范工作。

本研究还探讨了正式社会化的另一个领域：处罚在促进遵守法律方面的作用。调查数据和对澳大利亚和菲律宾军队官兵的采访表明，与“国际人道法”本身相比，国内法和军法规定的处罚威胁影响更大。这一调查结果证实了将国际人道法规范纳入国内法、标准作战程序和交战规则的重要性。然而，尽管内部军法下的处罚威胁对士兵——特别是对军官——有很大影响，但非正式规范和“军队价值观”的社会化效果超过了这种影响。

³⁰ Andrew Bell, “Measuring the effect of norm socialization on the treatment of civilians: An analysis of U.S. army conduct in Iraq and Afghanista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San Francisco, 31 August–3 September 2017; Christopher H. Warner et al., “Effectiveness of battlefield-ethics training during combat deployment: A programme assessment”, *The Lancet*, Vol. 378, September 2011, pp. 915–924.

³¹ 本章以安德鲁·贝尔对澳大利亚军队和菲律宾军队进行的实证研究为基础。

³² 戴维·基尔卡伦访谈，日内瓦，2017年11月29日。

2.3 非正式社会化过程

近几十年来，同伴团体中的非正式规范对士兵态度和行为的重大影响受到极大关注，这表明士兵之间的“兄弟情谊”这种社会纽带往往会超越爱国主义或意识形态，成为战斗和杀戮的理由。³³“绝不丢下一位战友”等不成文规范深深根植于各类国家武装部队官兵的心中。澳大利亚和菲律宾军方的数据体现了此类非正式规范和社会化过程的重要作用。

各级官兵经常指出兄弟情谊规范（或澳大利亚军队中的“伙伴关系”）对士兵的观点和行动有着根本性的影响。在采访中，士兵们指出反叛乱战争具有权力分散的特点，小部队在远离中央指挥部的地方作战，这进一步增加了这种影响。兄弟情谊这一纽带在特种部队成员中尤为明显，他们是独立于常规部队的小型作战单元，成员之间关系紧密。

军队中非正式规范的作用突出体现在：尽管军法、改革和纪律措施试图消除性虐待和“欺凌”仪式（以形成团队凝聚力为名义，对新兵实施的恶劣且往往有辱人格的入伍礼），但这些现象仍持续存在。伍德和托普伯格（Toppelberg）对美国军队的研究表明，非正式机制淡化了性侵问题的严重性，将性侵定为一种适当的惩罚形式，并纵容对举报者实施的报复行为。³⁴澳大利亚针对1971年至2009年间发生于该国军队内部的欺凌和其他形式的虐待行为进行了11次正式调查，包括几次议会调查，但仍有新的虐待案件出现，³⁵促使澳大利亚军队针对价值观进行了特别重申。

“非正式规范是一把双刃剑，既可强化、也可破坏正式组织规范。”

因此，非正式规范是一把双刃剑，既可强化、也可破坏正式组织规范。毫无疑问，非正式规范增加了部队凝聚力，但是当官兵们开始“在出现不当行为的情况下互相保护以免受制度处罚”时，这种凝聚力就成了问题。³⁶当对团体的忠诚取代对整个组织的忠诚时，目击者或许不会报告不道德行为，因而会损害合规机制确保遵守规则的能力。

³³ See, for example, Guy L. Siebold, “The essence of military group cohesion”, *Armed Forces & Society*, Vol. 33, No. 2, January 2007, pp. 286–295; Charles Kirke, “Military cohesion, culture and social psychology”, *Defense & Security Analysis*, Vol. 26, No. 2, June 2010, pp. 143–159.

³⁴ Elisabeth J. Wood and Nathaniel Toppelberg, “The persistence of sexual assault within the US military”,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54, No. 5, September 2017, pp. 620–6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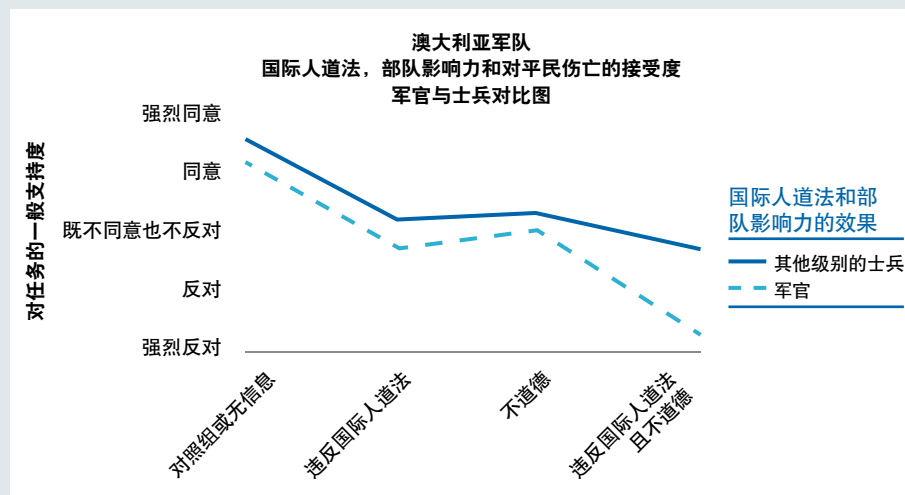
³⁵ Richard Evans, “Hazing in the ADF: A culture of denial?”, *Australian Army Journal*, Vol. X, No. 3, 2013, pp. 113–127, at 117.

³⁶ Denny Neave and Craig Smith, *Aussie Soldier: Up Close and Personal*, Big Sky Publishing, Wavell Heights, 2008, p. 52.

最后，调查实验进行了一项测试，假设一场军事行动可能会导致重大平民伤亡，那么影响战斗员不实施该行动所需的同伴团体比例是什么（25%、50%或75%）？对澳大利亚和菲律宾军队来说，同伴团体的意见似乎会发挥重要作用，可以促使战斗员约束自身行为，同伴团体比例超过50%时，其作用会逐渐减少。这表明，关注促进国际人道法的人无需确保部队所有成员都将行为约束规范内化；即使是半数或少于半数的人员遵循行为约束规范，也能让其战友们意识到保护平民的必要性。

正式与非正式影响因素

下图比较了国际人道法这种正式机制和同伴团体影响这种非正式机制对澳大利亚军队官兵行为取向产生的不同作用。



在一个调查实验中，参与者被要求针对能否攻击位于居民区的高价值炸弹制造者向指挥官提供建议。除了假设攻击行动可能会造成平民伤亡之外，对照调查没有提供更多信息。调查一补充指出，该部队法律官员表示这一行动违反国际人道法。调查二补充指出，大多数官兵认为这项行动是不道德的。调查三同时提供了这两方面的信息。

有意思的是，与士兵相比，澳大利亚军官受国际人道法及其部队成员意见的影响更大。上图表清楚地表明，正式和非正式社会化机制的综合效应对改变军官的观点影响最大。

2.4 强调道德规范

澳大利亚和菲律宾军队试图调和正式与非正式社会化过程的方式似乎都是强调“军队价值观”：各级官兵经常提出此类价值观是影响行为的重要因素。³⁷这些道德价值观似乎对法律起到了强有力的补充作用，构成了正式和非正式规范的混合体，在遏止不当行为时，不仅因为它“违反规则”，还因为它“与我们的价值观不符”。将它称为混合体的原因在于，价值观并不像法律那样可以得到正式实施——除非违反价值观的行为也违反了法律——但是组织内的职业发展以及对彼此的尊重显然取决于这些价值观的体现程度。

2013年，澳大利亚国防军内部发生了上述性虐待丑闻后，澳大利亚军队在原有的“勇敢”、“进取”、“团队合作”等价值观中增加了“尊重”，这体现了将价值观作为社会化工具来推动行为符合组织规范。为呼吁士兵遵守道德价值观，时任军队参谋长戴维·莫里森 (David Morrison) 中将在提倡“尊重”时表示：

我从未听说过军营里的懦夫能够成为战场上的英雄。羞辱战友的欺凌者是懦夫，那些看着战友受害却袖手旁观、没有道德勇气挺身而出的人也是懦夫。³⁸

这种对个人荣誉的呼吁在澳大利亚和菲律宾军队士兵中引发共鸣。用一名澳大利亚士兵的话来说，战斗后“你需要能够照镜子看着自己，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这一点就是本研究与《战争中行为的根源》所得结论的不同之处。《战争中行为的根源》反对诉诸道德价值观，认为道德价值观是相对主义、并不可靠，它主张一板一眼地遵守命令、纪律和等级制度。³⁹它认为战斗员在道德上并不具有自主权，但这与不允许以“我只是在执行命令”为辩护理由的裁决相矛盾。军事训练确实力图培养机械反应能力并限制个人的道德自主权；然而，调查和采访数据表明，以价值观为导向的行为动机实际上与处罚威胁一样都是影响战斗员行为的重大因素。⁴⁰

37 Amelia Hoover Green, “Armed group institutions and combatant socialization: Evidence from El Salvador”,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54, No. 5, September 2017, pp. 687–700; “The commander’s dilemma: Creating and controlling armed group violenc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53, No. 5, September 2016, pp. 619–632.

38 2013年7月4日，汤斯维尔市拉瓦拉克军营 (Lavarack Barracks)，澳大利亚军队参谋长戴维·莫里森中将在澳大利亚军队第四项价值观“尊重”宣布仪式上的讲话。

39 如欲了解更多关于这一观点的详细评论，见：Dale Stephens, “Behaviour in war: The place of law, moral inquiry and self-identity”,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Vol. 96, No. 895/896, December 2014, pp. 751–773.

40 实际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并没有把工作仅限于法律方面。在2016年《日内瓦第一公约》第47条的评注中，脚注4提到《战争中行为的根源》研究并补充说：

为有效引导符合法律的行为，国际人道法不能作为一套抽象和独立的法律规范来教授，而必须纳入所有常规军事活动、培训和指导中。这种法律纳入工作应旨在激励并影响军队文化及其基本价值观，以确保尽可能将国际人道法的法律考量和原则纳入军事理论和决策。

这种对组织身份、“战士荣誉”和道德行为的强调，使士兵能够将行为约束规范内化，促进遵守国际人道法，其作用是仅靠执法机制无法达到的。在权力分散的反叛乱战争中，由于部队在远离指挥官监督和上级指挥执法机制的地方开展行动，因此除实施基于国际人道法的处罚措施外，更有必要实现规范内化。

研究发现，法律及其根本价值观两者缺一不可，具体侧重点取决于目标受众。法律在制定标准方面至关重要，但确保法律所代表的价值得到内化，似乎可以更持久地促进行为约束。尽管军事行动过去十年来不断合法化——有些人称之为“法律之战”⁴¹——但英国历史学家约翰·基根 (John Keegan) 的话如今依然适用，在反叛乱战争中更是如此：

荣誉是促进战场正当行为的利器，其作用无可取代，过去是这样，未来也如此。战场杀戮之地，没有法官定夺是非，也没有警察执法。⁴²



⁴¹ 专门讨论该话题的博客：<https://www.lawfareblog.com>。

⁴² John Keegan, cited in Michael Ignatieff, *The Warrior's Honor: Ethnic War and the Modern Conscience*, Vintage, London, 1999, p. 118.

2.5 社会化的挑战

这项研究还发现了一些关键问题，对战斗员行为约束规范的社会化构成了挑战。或许最大的挑战是前线服役的年轻士兵对抽象法律原则和道德规范所持有的怀疑态度，当他们及其战友面临致命风险时更是如此。此外，如果己方坚持在军事行动中遵守国际人道法，但敌方却持续违反该法，这种情况就会成为战场上遵守这些原则的主要障碍。因此，在敌方不遵守国际人道法的情况下，士兵质疑为何自己仍应遵守该法时，从价值观的角度强调行为约束将有助于促进遵守法律。

因此，寻找应对这种怀疑态度的方法是负责推广国际人道法和行为约束规范者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调查和采访均表明，初级士官树立的榜样对初级士兵的思想和行为影响最大。因此，在小型作战单元向初级士兵推广和传播行为约束规范时，此类领导人员应发挥核心作用。从许多方面来看，初级士官必须和高级营长一样参与国际人道法培训，因为只有当这些级别的军官采用这些规范时，士兵才会实现正式和非正式社会化。

此外，本研究的证据表明，宗教认同可以成为培养战斗员忠诚度的另一个侧重点，特别是对穆斯林士兵来说，因为与国际人道法相比，他们更加认同伊斯兰教法的原则。为减少这两种影响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培训人员必须强调在为平民力行克制和禁止使用某些作战手段和方法方面，国际人道法和伊斯兰教原则之间的关联性，并使用适合特定情况的语言和案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整个穆斯林世界的国家和非国家实体举行此类研讨会，强调了这两个体系之间的共同原则，并指出伊斯兰教法比国际人道法早一千多年。例如，2018年初在菲律宾奎松市的菲律宾国家警察执法研究中心举行了一场与武装冲突有关的伊斯兰法及国际人道法和穆斯林习惯与传统研讨会。

2.6 研究意义

这项研究表明，“纳入法”在影响战斗员对平民的行为方面仍发挥重大作用，但它需要完全针对目标受众，进行强化教学，并在压力环境中进行测试。

然而，一些研究结果与《战争中行为的根源》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特别是后者强调法律高于价值观，而本研究提出将两者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社会化机制相结合，可以为提倡行为约束提供更广泛的基础。



集权式 非政府武装团体



3.1 特征

集权式非政府武装团体的主要特征是：

- 领导层通过严格的等级制度对下级行使严格的指挥和控制
- 有明文条令条例或意识形态概述说明该组织的目标、方法和世界观
- 明显的纪律标志 (制服、敬礼、例行工作具有专业性)
- 与平民居民隔离 (驻扎在营地或军营中)

集权式非政府武装团体具有一体化国家军队的许多结构特征，包括等级制度明显、条令详尽、纪律严明。但是与国家军队不同，他们无法从国家资源和基础设施中获益，这给领导层与一线指挥官及其部队进行沟通并对其行为实施监督带来更大挑战。为了使其思想和行为取向与领导层一致，团体成员需要经过一系列几乎渗透其日常生活各个方面的社会化和控制过程。这个过程重塑了成员的身份，建立了对整个组织的忠诚。他们信奉的意识形态多种多样，如共产主义或圣战萨拉菲主义 (Salafi jihadism)。

冷战期间，许多非洲解放运动组织以及中美洲和亚洲的左翼革命武装力量是以高度集权的方式组织起来的，部分原因是它们作为超级大国对抗的代理人获得了外部资金支持。当今世界，此类团体在开展活动的非政府武装团体中仅占少数，但其军事能力使它们在一些武装冲突中发挥了突出作用。最近有关集权式武装团体的例子包括：1996年至2006年与尼泊尔政府作战的尼泊尔共产党 (毛主义)；20世纪70年代末至2009年与斯里兰卡政府作战的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菲律宾的摩洛民族解放阵线，以及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国组织。

本章研究的重点是活跃在哥伦比亚长期内战中的两个非政府武装团体，即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和哥伦比亚民族解放军，前者在2016年与政府签署了和平协议，结束了长达52年的冲突，但后者仍然十分活跃。⁴³这两个武装团体建立之初就采用了高度集权的组织结构，但民族解放军在20世纪70年代初经历了一场残酷的内部清洗并险遭哥伦比亚武装部队歼灭，这导致其权力分散。新的民族解放军选择了上下级指挥官之间更具协作性的决策机制和分权结构，这样任何领导人都不会再拥有足够的权力来杀害或驱逐同僚。基于这些经验，本章揭示了武装团体的组织结构、意识形态和制度对暴力与行为约束模式的影响。

3.2 不同的暴力与行为约束模式

根据现有数据，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和民族解放军在暴力和行为约束模式上既有相似也有不同。这两个团体对平民使用的暴力类型相似，包括屠杀、谋杀、绑架、招募未成年人、敲诈、破坏基础设施和强迫流离失所。与准军事团体不同，在民族解放军和革命武装力量中，强奸行为并不普遍存在，他们也不扣押货物或财产。然而，这两个团体的暴力子模式却存在显著区别。即使考虑到团体规模的差异（革命武装力量有时是民族解放军的两倍至四倍），革命武装力量实施的平民屠杀次数是民族解放军的七倍，埋下的地雷个数是民族解放军的十倍，招募的未成年人数量也是民族解放军的四倍。相比之下，民族解放军虽然规模较小，但实施绑架的次数几乎与革命武装力量相同，并长期对基础设施进行破坏，特别是输油管道。

意识形态和武装团体结构是造成上述某些差异的原因。如表二所示，这两个武装团体都信奉马克思主义，并声称他们参与了人民战争。然而，民族解放军的意识形态受到切·格瓦拉“革命人道主义”的极大影响，融入了强调自我牺牲、英雄主义和同情穷人的天主教价值观，而革命武装力量的意识形态则更注重阶级斗争方面。尽管这两个武装团体都认为“不尊重群众”是一种严重罪行，⁴⁴如偷窃者会被处以死刑，但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导致两者发展轨迹不同，最终导致行为差异。例如，民族解放军最初出于道德原因禁止在其控制的地区种植古柯，从而放弃了一笔额外资金，而革命武装力量则通过种植古柯将自身发展为类似于军队的组织。革命武装力量从阶级斗争角度看待平民，认为平民不是非法目标，杀害和绑架“阶级敌人”的行为是正当的。这两个团体对国际人道法的接受程度也有所不同：民族解放军支持“人道战争”，而革命武装力量仅部分采纳国际人道法，宁愿结束战争，也不愿使战争人道化。革命武装力量特别反对国际人道法禁止招募未成年人入伍，认为15岁是可以接受的年龄。

⁴³ 本章借鉴了由弗朗西斯科·古铁雷斯·萨宁主导开展的实地研究，该研究以本出版物前言部分介绍的工作方法以及此前的著作为基础，著作包括：Francisco Gutiérrez Sanín, “Telling the Difference: Guerrillas and Paramilitaries in the Colombian War”, *Politics & Society*, Vol. 36, No. 1, March 2008, pp. 3–34; Francisco Gutiérrez Sanín and Antonio Giustozzi, “Networks and armies: Structuring rebellion in Colombia and Afghanistan”, *Studies in Conflict & Terrorism*, Vol. 33, No. 9, August 2010, pp. 836–853; and Francisco Gutiérrez Sanín and Elisabeth J. Wood, “Ideology in civil war: Instrumental adoption and beyond”,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51, No. 2, March 2014, pp. 213–226.

⁴⁴ 哥伦比亚人民军章程第1章第1条。民族解放军的规则更加详细，有一整章是有关“对平民大众的行为”的强制性规则。

表二：前革命武装力量与民族解放军对比表

标准	革命武装力量	民族解放军
组织蓝图	军队	游击队
意识形态	共产主义	切·格瓦拉和基督教解放神学
关于平民的具体意识形态	有关国际人道法的争论； “战争不需要人道化，必须终结战争”	“战争必须要人道化”
成员身份	终身，难以退出	相对宽松
指挥结构	高度集权	相对分散，但非网络状

在组织结构方面，下图突显了革命武装力量和民族解放军采用模式的差异。两者都是纪律严明、组织性强的武装团体，但程度不同，对行为控制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革命武装力量拥有严格的等级制度、强有力的纪律机制和全方位的社会化过程，能够在单位层面遏制机会主义暴力。因此，它的大多数暴力行为是高层下令实施的。民族解放军更难控制自己的武装人员，因此并非所有暴力行为都符合该团体的政治目标。事实上，所有团体一线部队的暴力模式都各不相同，这表明中级指挥官有解释规则和作出决定的余地。意识形态充满了模棱两可和潜在相互抵触的内容，长期由部队领导、中层干部和普通士兵自行解读。为证明行动的正当性，他们会强调条令条例的某些方面，重新解释规则，重新命名主体（例如将“人”重新定义为“告密者”）。因此，意识形态为允许实施的暴力与行为约束划定了范围，然后再经由社会化的制度和机制变为可见的行为。

革命武装力量的士兵展示了高度集权的武装团体的军事风格，而民族解放军的宽松方式更接近分权模式。



3.3 社会化机制

革命武装力量和民族解放军的武装人员都会经历一个行为取向和个性转变的深层过程，该过程强调革命道德。革命武装力量通过严格的规则、军队般的训练、紧张的日程及其他主导成员生活的行为来巩固这一转变。首先，革命武装力量的成员身份是终身的，逃兵如果被抓会被处决。新兵仅享有三个月的宽限期。第二，从20世纪70年代起，革命武装力量开始招募妇女，创建了一个自给自足的项目，鼓励成员在组织内部开展全部个人生活和性生活，但禁止怀孕。⁴⁵极力劝阻成员勿与社会进行非正式接触。第三，每天的训练、锻炼和政治教育课程占用了所有非战斗时间，继而强化了革命武装力量条令条例中的规范，并营造一种共同的纪律和归属感。灌输这种组织文化的目的是改变约束某些暴力形式（如强奸）的理由，从“违反规则”转变为“与我们的价值观不符”。第四，革命武装力量建立了特定制度，使得对成员和平民的“审判”受到上级监督，而不是通过临时性、暴力手段来解决。大多数情况下（但不是所有），这些制度在控制行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每支部队对其武装人员的控制程度均可通过强奸数据予以说明，强奸是一种通常与武装冲突相关的暴力形式。革命武装力量和民族解放军均严令禁止强奸，无例外情况，即使是对敌方或忠于敌方的社区也是如此。强奸可处以死刑。尽管众所周知，强奸事件一般都存在严重漏报的情况，但现有数据表明，特别是与准军事部队相比，革命武装力量和民族解放军较少出现强奸事件。绑架受害者的叙述也证实了这一现象。著名政治领袖英格丽德·贝当古（Ingrid Betancourt）被革命武装力量严刑关押了六年，但她没有报告过一起强奸案。⁴⁶其他曾遭劫持的人质⁴⁷虽对革命武装力量没有好印象，但也陈述了同样的事实。⁴⁸因此，在符合自身利益时，这两个武装团体都能够力行克制。

3.4 社区作为行为约束的一个因素

如上所述，两个武装团体的制度都对武装人员行为具有决定性影响。革命武装力量和民族解放军似乎不太关心其暴力行为（特别是绑架）的政治代价。革命武装力量只有在和平谈判开始后才停止绑架行为，而民族解放军仍在实施绑架。本章最后一部分将探讨，面对日益旷日持久的冲突，人道组织较为关注的一个相对较新的研究领域：即社区在影响武装团体行为中的作用。

⁴⁵ Francisco Gutiérrez Sanín and Francy Carranza Franco, “Organizing women for combat: The experience of the FARC in the Colombian war”, *Journal of Agrarian Change*, Vol. 17, No. 4, October 2017, pp. 770–778.

⁴⁶ Ingrid Betancourt, *No hay silencio que no termine*, Aguilar, Bogotá, 2012; “Dura experiencia del secuestro convirtió a Ingrid Betancourt en símbolo de la libertad en el mundo”, *El Tiempo*, 8 October 2008; “Así fue el secuestro de Ingrid Betancourt”, *El Espectador*, 3 April 2008.

⁴⁷ 与民族解放军相比，被革命武装力量绑架的人对绑架事件作出了更多的陈述。

⁴⁸ See, for example, Centro Centro Nacional de Memoria Histórica, *Una verdad secuestrada: Cuarenta años de estadísticas de secuestro 1970–2010*, Imprenta Nacional, Bogotá, June 2013; and Clara Rojas, *Captive: 2,147 Days of Terror in the Colombian Jungle*, Simon and Schuster, New York, 2009.

奥利弗·卡普兰开展的研究工作⁴⁹，主要关注哥伦比亚，记录了平民社区如何积极影响武装参与方并限制暴力。团结一致、组织良好的社区，尤其能够发挥积极作用。

社区采用几种策略来实现这一目标。首先，通过促进积极中立的文化和划定安全地带，他们可以抵制本社区成员被招募或成为任何一方的线人。在这方面，社区凝聚力至关重要，能够避免某些成员与武装参与方合作并从中受益。随着时间的推移，表现出非党派性会抑制武装团体进入划定的地带。

第二，强大的社区可以实施当地冲突解决进程。这可避免平民请求外部实体帮助解决当地争端，特别是在国家机构力量薄弱的地方更是如此。这也避免给武装参与方提供参与社区事务、利用分歧为自己谋利的借口。

第三，社区可以建立地方调查机制来澄清对有通敌嫌疑者的指控。武装团体可能会将平民的活动误解为帮助敌方，或者对手可能会诬告另一个社区成员。通过建立平民透明程序，为被诬告的嫌疑人而不为已证实的通敌者提供担保，可以减少对被诬告者的暴力行为。这种调查程序是在与有关武装团体的对话中建立的，目的是说服他们允许平民维持自己社区的治安。

这些机制的可行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区领导能力和凝聚力的强弱，以及社区成员是否愿意践行行为约束。正如社区的积极作用经常被人道组织忽视一样，它们的消极作用也经常被忽视，从阿富汗、哥伦比亚到马里和叙利亚的冲突中就可以明显看出，在这些地区，社区要求对被视作威胁社会秩序的人实施暴力，特别是罪犯。

3.5 研究意义

这项研究表明武装团体组织结构和意识形态对集权式非政府武装团体成员的行为具有重要影响，在许多方面类似于国家武装部队的条令条例和等级制度。主要差异在于非政府武装团体的监督机制薄弱，可能会不利于遵守中央指挥部门的命令，也在于全方位社会化进程监督机制薄弱，而这一进程对促使成员行为与领导层行为保持一致至关重要。

集权式非政府武装团体强烈的意识形态动因为讨论其行为是否符合条令条例所支持的原则和目标提供了切入点。这就需要深入了解条令条例的细则，以及可能出现的矛盾、模糊和漏洞之处，这些都可以用来为某些行为辩护。

⁴⁹ In particular, see Oliver Kaplan, "Protecting civilians in civil war: The institution of the ATCC in Colombia",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50, No. 3, May 2013, pp. 351–367, and *Resisting War: How Communities Protect Themselv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and New York, 2017. See also Juan Masullo, "A Theory of Civilian Noncooperation with Armed Groups: Civilian Agency and Self-Protection in the Colombian Civil War", doctoral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s, 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Florence, August 2017.

社区在影响武装团体行为方面的作用值得进一步探究，特别是考虑到社区凝聚力与其保护成员免受暴力侵害的能力之间的关联性。人道组织正在日益探索支持社区开展自我保护的方法，这对于应对旷日持久的冲突尤为重要，因为暴力已成为常态而非偶发情况。但是，援助组织需注意开展相关工作是否会给相关社区以及援助组织的中立性带来负面影响，因为公众对援助组织中立性的看法决定了人员安全、接触社区的机会以及与武装部队和武装团体对话的能力。这一点将在第六章中再次探讨。



分权式 非政府武装团体



4.1 特征

分权式非政府武装团体的主要特征是：

- 小型武装团体的联盟，各团体的指挥官对其成员拥有相当大的决策权，并负有重要责任
- 联盟不稳定，因为领导者及其团体可能会脱离联盟，以组成或加入新的联盟，但这并不损害团体凝聚力
- 多个分权式团体可在基地组织或伊斯兰国组织等更广泛的运动中开展合作，使其获得地方、区域和全球影响力
- 联盟内部协作并不密切，包括军事计划和行动协作
- 很少有迹象表明存在军事纪律 (如没有制服、敬礼和例行工作)。

分权式非政府武装团体通常由许多小型团体联盟组成，这些团体各自的下级指挥官拥有重大权力。尽管这些联盟看似是一个单一的团体，但实际上它们是以小型自治团体联合体的方式进行运作。联盟构成多变，子团体规模较小，可能导致看似混乱无序的暴力。然而，此类联盟已对利比亚、叙利亚和也门组织结构更完善的敌对方构成严重挑战。维持混乱的形象便于指挥官迷惑敌人，同时帮助经济资助者远离对团体行动负有的责任。当今世界，开展活动的非政府武装团体中，分权式武装团体占大多数，主要出现在中东和北非。它们的分权性和不成文行为守则尤其导致人道组织难以与其进行接触，增加了人道行动环境的复杂性。

当今世界，开展活动的非政府武装团体中，分权式武装团体占大多数。

分权式非政府武装团体激增，面对更强大的国家军队时生命力顽强，在某种程度上都得益于横向组织结构较强的适应力。他们的组织形式使得其难以落败，因为没有任何一个独立子团体能影响到整个联盟的存亡。这些团体不依赖中央指挥部的指示和供给，但同时又可以战略上集中和分配资源。这种联合体的另一个优点是，可以纳入来自当地社区的团体，将当地的不满情绪与更广泛的政治目标联系起来，提供了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空间，牧民也可以成为外国武装人员。

正如本报告后文所述，武装团体权力越分化，该团体受外部因素的影响就越大。外部参与方利用宗教、社会、政治和经济力量来影响武装团体。但这种力量也会随着武装团体和这些实体之间权力平衡的变化而发生改变。

为探讨这一极具多样性的武装团体类型内部的一些变革动力，本章比较了马里的两个分权式团体：“伊斯兰卫士组织”和“西非圣战统一运动”。⁵⁰尽管两者都受到基地组织全球呼吁的启发，但各自使用暴力和实施约束的方式却不同。这说明即使这两个团体采用相似的圣战萨拉菲主义方法论，但当地参与方仍可以影响分权式团体的行为。本章还探讨了当地神职人员在与“伊斯兰卫士组织”和“西非圣战统一运动”谈判时如何引用西撒哈拉本土的伊斯兰教法理。

4.3 不同的暴力与行为约束模式

2012年，图阿雷格分裂主义叛乱组织 (Tuareg separatist rebellion) 将地方政府从马里北部驱逐后，圣战组织联盟控制了该地区。这些圣战组织通过政治策略而非军事胜利赶走了图阿雷格族分裂分子，抽走了他们的战斗员，并与有影响力的民间领袖建立了联盟。

这项研究考察了其中两个圣战组织——基达尔地区的“伊斯兰卫士组织”和加奥地区的“西非圣战统一运动”——在2013年1月法国军事干预之前是如何控制和治理马里北部地区的。⁵¹两者都借鉴基地组织及其两个主要人物奥萨马·本·拉登 (Osama Bin Laden) 和艾曼·扎瓦希里 (Ayman Al-Zawahiri) 倡导的伊斯兰教原则，建立了一套治理体系，但同时也均自诩他们遵循的是植根于西撒哈拉历史纯正的伊斯兰教法。

管理马里北部的工作成为圣战萨拉菲主义项目中使用、规范和控制暴力行为的一场实地实验。⁵²然而，伊斯兰教规管理的社会并没有一套明确的规则，因此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组织有关“叛教 (takfir)” (宣布一名穆斯林同胞不信奉伊斯兰教) 和攻击穆斯林的行为的政策才不断变化。⁵³

这里研究的这两个团体以不同方式利用“叛教”等概念来证明对其他穆

⁵⁰ 本章以伊万·吉沙瓦和费尔多乌斯·布莱尔开展的研究为基础。

⁵¹ 在此之前，马里临时政府正式要求法国提供军事援助，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2085号决议于2012年通过。“薮猫行动”于2013年1月开始，2014年8月被“新月形沙丘行动”取代。

⁵² 这一过程可以说也渗透到了社会实践中，再次引发了对治理工作的质疑，并带来了持久的影响，例如重新界定了当地伊斯兰法院法官的作用。

⁵³ As shown by Donald Holbrook, *The Al-Qaeda Doctrine: The Framing and Evolution of the Leadership's Public Discourse*, Bloomsbury Press, London, 2014, and Thomas Hegghammer, "The ideological hybridization of jihadi groups", *Current Trends in Islamist Ideology*, Vol. 9, November 2009, pp. 26–45.

斯林发动战争的正当性或巩固各自在基达尔和加奥的联盟关系。例如，“伊斯兰卫士组织”并未像“西非圣战统一运动”那样经常实施自杀式袭击、袭击其他马里武装团体或虐待被拘留者。“伊斯兰卫士组织”还禁止强迫婚姻和劫持外国人质，而“西非圣战统一运动”的治理政策并未禁止这两种行为。这两者意识形态相似，但为何作出的选择却截然不同？当地知名人士对这些选择产生了何种影响？每个团体的发展历史及其社会化机制为回答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些线索。

4.4 不同的社会嵌入程度和社会化机制

尽管“伊斯兰卫士组织”和“西非圣战统一运动”的意识形态相似，但两者与当地社会网络的关系和各自的社会化机制却有所不同。“伊斯兰卫士组织”主要是一支由图阿雷格人构成的运动，与基达尔当地部落网络有历史联系。该团体领导人与当地社区建立的长期关系，便于从这些社区大量招募成员，进一步加强了相互联系。“伊斯兰卫士组织”之后控制的领土也是马里北部唯一一个图阿雷格人占多数的地区。⁵⁴这解释了为何“伊斯兰卫士组织”几乎没有受到图阿雷格分裂分子的抵抗就控制了基达尔。相比之下，加奥不仅是区域商业中心，而且也更加多样化，历史上一直充斥着多数族群桑海人与当地图阿雷格人和阿拉伯群体之间的族群竞争和暴力。“西非圣战统一运动”利用这些分裂，与多数族群桑海人结盟，取代了控制该市的图阿雷格分裂分子。

与“伊斯兰卫士组织”相比，“西非圣战统一运动”的成员更加多样化，融合了来自整个地区的武装人员。因此，该团体与它之后控制的城市加奥之间联系较弱。“西非圣战统一运动”的多样性也反映在其结构中，它的联盟关系比“伊斯兰卫士组织”更松散。它以基地组织教义和军事训练手册为基础，组织训练营来建立凝聚力。根据指挥官在阿富汗和阿尔及利亚的经验，该组织利用基地组织长期建立的训练制度作为区域招募工具和该组织的主要社会化机制。在“西非圣战统一运动”控制了加奥之后，这些训练营重塑新兵身份并使其效忠该组织的能力得以显现。该组织扩大了招募范围，招募并训练当地族裔群体，成为武装人员和自杀式炸弹手，并迅速成为该组织进攻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相比之下，“伊斯兰卫士组织”追求的目标是实现图阿雷格民族主义，这尤其与图阿雷格社区长期的反叛历史相契合，对当地武装人员具有吸引力，并响应了社会不公正现状的说法。该组织能够较快适应当地的社会化过程，新兵也很容易融入其中，这均得益于曾经并肩作战的经历所形成的强大凝聚力。“伊斯兰卫士组织”从政治上巩固了图阿雷格部落的团结，这也有利于从军事上统一这些小型团体。

⁵⁴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Mali: Security, Dialogue and Meaningful Reform*, Africa Report No. 201,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Brussels, 11 April 2013, p. 11.



4.5 影响力、权威和合法性来源

在这两个案例中，当地参与方对“伊斯兰卫士组织”和“西非圣战统一运动”的命运均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随着当地参与方权力和权威的变动，其影响力以及规制其行为的规则和社会规范的影响力也在发生变化。这两个武装团体都曾一度严重依赖社区知名人士来获得主导地位，但此举却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效果。获得主导地位的过程极为复杂，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包括当地伊斯兰传统、当地族群冲突历史、对贩运路线控制权的争夺、脆弱的军事控制以及社区对圣战组织推崇的伊斯兰意识形态的看法。因此，尽管基地组织对这两个团体的用语和政策有很大影响，但探索三类参与方如何利用其影响力和权威以不同方式影响事件进程是大有裨益的。

当地商业精英

为取代图阿雷格分裂分子及其统治，两个武装团体均在不同程度上依赖当地商业精英的支持。在加奥，战前经济蓬勃发展，得益于跨境贸易和贩运者的投资（加奥快速发展的街区之一，甚至被命名为“可卡因城”）。但图阿雷格分裂主义叛乱组织威胁到这些商业利益和桑海族群的政治主导地位。因此针对分裂主义者据称实施的大规模抢劫和强奸行为，⁵⁵由阿拉伯商人主导的商业精英们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与占领加奥的武装团体进行谈判。⁵⁶在此期间，两个武装团体都没有控制这个城市，均试图通过哄骗、恐吓或伤害民众的方式夺取主导权。这些团体竞相争取社区和商业委员会的支持，体现了这些参与方所具有的重要影响力。

⁵⁵ Human Rights Watch, *Mali: War Crimes by Northern Rebels*, Human Rights Watch, Bamako, 30 April 2012.

⁵⁶ 该商业团体名为长老协商委员会 (Conseil de Concertation des Sages)，成立目的是向占领加奥的武装团体传达民众需求。

图阿雷格分裂分子肆无忌惮的暴力行为最终促使商业精英们在经济和政治上支持“西非圣战统一运动”控制加奥，以保护企业和民众。基达尔的商业力量虽并不强大，但也在“伊斯兰卫士组织”巩固控制权方面发挥了支持作用。

当地伊斯兰教学者和法律制度

“伊斯兰卫士组织”和“西非圣战统一运动”均采用伊斯兰教规和基地组织方法(manhaj)建立治理体系，规制针对潜在敌人和非战斗员的武力使用行为。就这两个组织而言，规范形成的基础都是构成伊斯兰教法理学基础的伊斯兰教经文渊源及“推定”渊源。然而，伊斯兰教法理学的内涵需要通过讨论和辩论予以解释。在基达尔和加奥，这是通过协商委员会完成的。这些委员会的决定影响公共行政管理和这些团体控制下的民众的日常生活规则。在加奥，伊斯兰教法庭也会进行辩论，使得民众能够更多地参与。“伊斯兰卫士组织”（基达尔）和“西非圣战统一运动”（加奥）在如何利用或削弱现有法律制度方面存在重大差异。

在基达尔，“伊斯兰卫士组织”依靠现有伊斯兰教法律体系来解释地方治理规则。这个法律体系包括来自当地昆塔部落由来已久的伊斯兰教法官。他们对规则的演变产生了具体影响。例如，正是这些法官公开认可了基达尔不再适用肉刑的决定。为这项研究进行的采访表明，与“西非圣战统一运动”相比，该组织行为相对克制，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与社区的联系和当地伊斯兰教法官发挥的调节作用。然而，这种约束力在基达尔之外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在法国军方开展了逮捕所谓“伊斯兰卫士组织”支持者、搜查营地和限制使用一些水井等行动之后，该团体的行为发生了巨大变化。

相比之下，“西非圣战统一运动”破坏了加奥原有的司法体系。它任命了新法官，在谁应合法拥有裁决权问题上引发了混乱和争论。当地宗教领袖借鉴当地伊斯兰教传统，对他们眼中伊斯兰教法的“错误”适用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纠正。然而，在“西非圣战统一运动”完全控制加奥之后，他们建立了一套规则（见方框），但禁止讨论应如何解释这些规则，并将规则解释权授予伊斯兰宗教警察。对此，抗议活动偶有发生，但遭到了警长的残酷镇压。包括当地伊斯兰教法官在内的当地参与方失去了主要影响力。然而，“西非圣战统一运动”继续对他们施以恐吓和贿赂的状况表明，该组织仍担心遭到他们的反对。

全球圣战萨拉菲主义者

“西非圣战统一运动”和“伊斯兰卫士组织”也受到全球基地组织网络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其分支机构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 (al-Qaeda in the Islamic Maghreb, AQIM) 进行联系。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对这些团体并没有进行直接指挥和控制，而是通过向其提供战略指导和培训施加影响。这种安排有利于双方。一方面与这些团体的联系增加了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区域影响力，另一方面“西非圣战统一运动”和“伊斯兰卫士组织”也能从基地组织的区域和全球合法性中获益。这些“网络之网”不断变化，表明由此形成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政治性和战略性，并突显出下级指挥官在决策方面的重要作用。此外，这三个团体均希望保持各自特有的身份，2017年三者建立联盟而非进行合并就反映了这一点。重要的是，影响力往往是互惠的，“西非圣战统一运动”和“伊斯兰卫士组织”等当地团体也可以对其上级团体及其地区分支机构的性质、政策和领导力产生影响。

西非圣战统一运动在加奥的规则

在采访中，一名加奥居民描述了“西非圣战统一运动”统治下的生活：抽烟者被施以鞭刑，抽一支烟罚抽一鞭，两支烟罚抽两鞭，十支烟则罚抽十鞭。

如纸板盒上有照片，盒子会被撕开。印有照片的米袋必须予以遮盖。

必须遵守的规则：妇女必须戴面纱；商店必须在星期五第一次宣礼时闭店；严禁销售和购买香烟；偷窃者要被砍断双手；未婚男女通奸被抽一百鞭；通奸者被处以石刑；拦路抢劫者要砍断右手和左脚。

来自法法 (Fafa) (位于通往尼日尔首都尼亚美公路上一个加奥选区) 的许多年轻男性经常对前往尼日尔的车辆进行拦路抢劫，因此他们均被施以最后一项处罚。

4.6 研究意义

如这些案例所示，地方、区域和全球参与方能够影响分权式武装团体指挥官的决策。在确定行为约束因素时，有必要了解这些不同类型的权威方及其影响力水平，以及连接主要指挥官及其支持者的网络。

我们的研究还反映出考虑武装团体成员的原则和世界观的重要性。根据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经验，熟悉武装团体的历史和意识形态背景对于与该团体进行有效对话至关重要。然而，许多团体在更广泛的运动中运作，需要与地方、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级进行协调接触，这使得情况变得更加复杂。

此外，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更广泛的伊斯兰教学者团体接触，强调伊斯兰教和国际人道法之间的共同点，并讨论人道关切问题。这种对话对于建立相互理解至关重要，也是影响行为的先决条件。如需达到此类对话的效果，就必须保持中立：任何国家以“打击暴力极端主义”为幌子，试图强行加入和利用这种接触，就可能会破坏这种对话。



社区嵌入式 武装团体



5.1 特征

社区嵌入式武装团体的主要特征是：

- 由来自当地社区的10至50名青年男子组成，有时成员中也有妇女
- 组成武装团体旨在保护社区利益
- 扁平型等级结构；领导人由团体选举或任命，会经常变动
- 动员活动不一定由团体决定，而是由社区权威人物（传统、宗教或政府人员）决定
- 通过加入仪式（成年仪式）和可视标志（疤痕、刺青、体饰等）促进形成团体凝聚力
- 动员活动具有暂时性，暴力冲突间歇团体成员可回归社区生活；团体成员可能会自身成为支持冲突一方的工具
- 行为守则不成文，反映当地价值观、习惯法和传统

社区嵌入式武装团体的成员通常是青年男子，他们为维护社区利益而参加战斗（参与防御或进攻）。他们不像一般的武装团体那样时刻保持战斗状态，而是在没有战事时恢复社区成员角色。由于缺乏国际人道法认定武装团体所必须具备的组织结构和负责任的指挥层，因此与已认定的武装团体相比，社区嵌入式武装团体受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关注较少。然而，此类团体的不断增加及其武装暴力造成的人道后果要求人们进一步了解其规范及影响因素。

由于存在各种各样的社区嵌入式武装团体，因此难以一概而论：阿富汗的阿巴基民兵组织、尼日利亚北部的治安团、中美洲的青年黑帮和巴布亚新几内亚高地的公社武装人员等团体之间几乎没有明显的共同之处。因此，本章将

着重探讨一种嵌入式团体，即南苏丹的蒂特文、格尔文和戈贾姆等武装游牧团体，找出可能有助于了解其他地方类似团体的特点和影响因素。⁵⁷

5.2 南苏丹武装游牧团体中的行为约束规范

2013年12月爆发的冲突使南苏丹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在过去五年目睹的暴力情况已经脱离了以前的行为约束道德规范。虽然原来也出现过杀害妇女、儿童和援助工作者等非战斗员的情况，但性暴力、杀害和残害儿童以及破坏村庄和医疗设施的规模之大、频率之高是前所未有的。丁卡社区军事化的蒂特文和格尔文游牧团体与努尔社区的戈贾姆（或称白军）游牧团体显然参与了这种暴力活动。

南苏丹丁卡社区和努尔社区都有暴力冲突中行为规制守则。⁵⁸他们认为能否从祖先和神灵那里得到护佑取决于是否遵守这些守则。丁卡人害怕致命污染（如“麻风病”），努尔人害怕精神污染（nueer），这些有助于防止违反行为守则。发生违反行为时，通过宗教仪式处理，通常涉及以牛献祭。习惯法院自一百年前成立以来，也一直在积极处理违反战时行为守则的行为后果。近几十年来，这些守则已经发生了变化，受到利用枪支获取权力的年轻人或为个人目的利用和重新诠释传统信仰体系的政治人物的挑战。例如，20世纪90年代的一位政治领导人辩称，与其他团体作战会带来精神危险，而与政府军作战则不会，因此无需对行为实施约束。这一主张也被用于证明当前冲突中攻击与朱巴政府结盟者是正当的。

虽然过去五年中目睹的许多暴力行为似乎是肆意妄为、混乱不堪的，游牧社区缺乏明显的等级结构又加深了这一印象，但不同层级的权威方都试图对暴力活动进行控制。对游牧团体的影响力争夺激烈且不稳定，并且因团体而异，导致难以确定某一时刻存在的各种影响因素。但是很明显，政治军事精英们利用这种不受控制的暴力状态来逃避武装和动员这些团体的责任，并抵制对其实施约束的呼吁。

⁵⁷ 本章以纳奥米·彭德尔2016年和2017年在南苏丹开展的研究为基础。此处提到的团体，并非所有都在正发生武装冲突的国家开展活动。

⁵⁸ See Francis M. Deng, *Tradition and Modernization: A Challenge for Law among the Dinka of the Sudan*,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1971; Francis M. Deng, *Customary Law in the Modern World: The Crossfire of Sudan's War of Identities*, Routledge, Abingdon, 2010; Edward E. Evans-Pritchard, *The Nuer: A Description of the Modes of Livelihood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of a Nilotic Peopl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1940; Sharon E. Hutchinson, *Nuer Dilemmas: Coping with Money, War, and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1996; Jok Madut Jok and Sharon E. Hutchinson, "Sudan's prolonged second civil war and the militarization of Nuer and Dinka ethnic identities", *African Studies Review*, Vol. 42, No. 2, September 1999, pp. 125–145.

5.3 社会化机制

青年人成为游牧团体成员所经历的严格的社会化过程解释了该团体所受影响变动性大、并为各方竞相争夺的原因。因为虽然可以动员成百上千人参加战斗，⁵⁹但他们仍对其从小所在的游牧营小团体及其所属社区保持忠诚。对丁卡人和努尔人来说，牛对于生计以及正义与秩序机制均至关重要，因此游牧人员在社区具有核心地位，深受尊敬。男孩们很小就被送进游牧营进行社会化，通过歌曲和故事认识行为规范和可实施行为的界限，并了解战斗带来的精神和人身危险。达到一定年龄或进入成年时，往往举行祭祀活动，培养对某个游牧营的归属感，庆祝他们成为社区保护者。过去几年来，一些游牧团体采用“制服”或其他标志来区分自己：有的团体脱下T恤衫绑在胳膊上，⁶⁰有的团体穿着专门定制的T恤衫。在格尔文游牧团体，特定发型表示所隶属的团体。

游牧营以民主方式任命领导者，使最受欢迎者成为首领。这为讨论和辩论创造了空间，首领随时都可以改变。首领有权解决小争端，就牛群活动作出决定，在与酋长和政府当局对话时代表其游牧营。最重要的是，首领决定团体作战的时间和方式，并亲自参加战斗。但是，这样的决定也受到不同权威方施加的巨大压力的影响。

攻击身份而非角色

在一些游牧团体中，针对受过教育的工薪人员等非战斗员，对其在住所或办公室和在镇上实施报复性杀害的事件有所增加。武器容易获得助长了这种现象：使用长矛需要的团体规模更大，因而可能触发更大规模的战斗。这种谋杀往往遵循一个以群体为中心的正义逻辑，即对一个人行为的报复可针对其所在团体。因此，如果一名格尔文人的某个家庭成员被杀，他将向杀人者家庭中与被杀者价值相当的成员寻求报复，而不论拟定目标是否无辜。由于教育和工资收入受重视，受过教育和（或）有工资收入的家庭成员越来越多地成为报复对象。援助组织在南苏丹是主要雇主，许多援助工作者被杀，不是因为他们与援助组织有联系，而是因为受家人牵连。

⁵⁹ 2014年，据称约四千至五千名戈贾姆战士向博尔城进军。

⁶⁰ 一名南苏丹研究人员在丁卡对一名蒂特文人进行的采访，大戈格里亚勒地区，2016年1月15日；Naomi Pendle, “‘They are now community police’: Negotiating the boundaries and nature of the government in South Sudan through the identity of militarised cattle-keepe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Minority and Group Rights*, Vol. 22, No. 3, July 2015, pp. 410–434.

5.4 行为影响因素与权威

在地方和国家层面、武装团体内外，国家军队和政治领袖、地方政府人员、酋长和宗教领袖之间，都竞相争夺权威。他们利用各种行为影响因素，包括社区历史、族群身份、文化规范和精神信仰。权威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不同社区权威不同，而且对外人可能并非显而易见。这里我们具体讨论三个行为影响方。

政治军事精英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苏丹人民解放军（苏人解）（The Sudan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SPLA）一直在武装和动员游牧团体，以应对喀土穆支持的北方民兵组织的袭击。⁶¹苏人解明显寻求通过取缔蒂特文团体内的年龄段设置来打破来自同一社区成员之间的紧密联系，正式将游牧人员纳入更大的军事编制。蒂特文的身份也被重塑为“社区警察”，将其置于政府控制之下，但这项工作取得的成效有限。⁶²2013年爆发暴力事件时，游牧团体经过武装和动员，通常（但不限于）以族群身份为政府作战或与政府对抗。苏丹人民解放军反对派（苏人解反对派）试图将戈贾姆团体组织成一个军事化组织，内部级别设置相当于苏丹人民解放军，但武装人员接受的正规训练很少，而且组织的权威性也不具有一致性。

一些政治军事精英通过资助游牧团体来获得对其的领导权。为了保护自己的牛群，许多政治军事精英将值得信任的家庭集合起来，组建自己的游牧营。他们向青年人提供弹药、牲畜防疫并承诺提供医疗和食物保证，使其为他们服务。于是，这些强大的精英们可以掌控行为走向，是趋于暴力还是约束。例如，确保牛群扩大的指示会引发袭击和战斗，而2009年丁卡族内部埃普克部落（Apuk）与埃朱乌克部落（Aguok）之间对富饶牧场之争被一位具有影响力的牧主平息。

酋长

丁卡族和努尔族酋长对社区牧民的控制程度各不相同。与丁卡族酋长相比，努尔族酋长影响力较小，其原因有两个：一是努尔族先知们与其竞争影响力，这一点下文讨论；二是由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府当局连续任命了一批酋长以增加对地方的影响，西努尔酋长与政府联系比较多。

丁卡族酋长对蒂特文团体和格尔文团体的行为有两方面重大影响。第一，酋长充当游牧团队首领与政府官员之间的中间人。他们可以根据提出的请求提出自己的意见。第二，他们主持习惯法院，决定如何重新分配牲畜进行赔偿索赔，以此裁定社区行为的是非曲直。为解决牧民之间的纠纷，酋长法院甚至会在旱季跟随较大的游牧营进行远距离迁徙以寻找水源。例如，2012年在伦拜克附近设立了一个特别酋长法院，以解决格尔文团体之间发生的恶性抢牛事件。在针对一次抢掠致死事件的赔偿判决中，酋长们对在实施抢掠前没有发出警告的男子处以更为严厉的处罚。发出警告，提醒妇女、儿童和其他非战斗员逃离是一项既定规范。⁶³

⁶¹ Luka B.D. Kuol, "Dinka youth in civil war: between cattle, community and government", in Victoria Brereton (ed.), *Informal Armies: Community Defence Groups in South Sudan's Civil War*, Saferworld, London, February 2017, pp. 19–26.

⁶² Naomi Pendle, "'They Are Now Community Police'".

⁶³ 2012年在克瓦乔克对丁卡族酋长的采访。

神圣权威

神圣权威人物对游牧团体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可以助长暴力或促进行为约束。社区成员和高级政府官员都向他们寻求指引，而且他们能够在精心安排的战前仪式上对战斗员施以护佑。一个重要的努尔族女先知因此被政治军事精英利用，政治军事精英向女先知捐赠大量牛只，而她需要对戈贾姆武装人员进行动员。

丁卡人和努尔人都十分相信对某些规则的违反会导致精神污染。他们认为丁卡族的鱼矛大师和努尔族的先知们都拥有通过祭祀和向神灵请愿帮助武装人员清除精神污染的力量。通过这个过程，这些人物可以重申行为约束规范。先知们长期以来在促进西努尔社区的道德秩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⁶⁴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杰德安杰·迪特 (Gatdeang Dit) 是布尔-努尔族 (Bul Nuer) 先知——属于掌管降雨与繁殖的天神 (divinity Deng)，他利用其影响力阻止了努尔武装游牧团体对他们的丁卡族邻居发动暴力袭击。与此同时，强大的鱼矛大师利用咒语威胁来影响丁卡游牧团体的行为。

然而，这些精神权威力量有两个弱点。第一，先知并非永久拥有神圣力量。不断需要实证证据来证明其力量，许多先知在未能保护牛群免遭抢掠后失去了权威。第二，有些戈贾姆武装人员感觉精神已经受到严重污染，再实施行为约束似乎也于事无补。30年的战争使努尔族分裂严重，以致兄弟之间可能会在战斗中相见。由于被精神污染的威胁所吞噬，许多人感到已经无法获得救赎，认为没有必要按照传统规范行事。用一个戈贾姆人的话来说：“努尔人在为精神遭受污染的政府而战……在这场战斗中，努尔人在与政府一起作战，在屠杀自己的族人。他们在做不人道的东西，例如强奸和折磨同族人。他们仿佛遭受了诅咒。”

5.5 质疑和重新解释社区规范

过去几年来，各个社区对侵害妇女、儿童的暴力行为的合法性开展了争论，争论的方式让人们了解到影响不同群体的信仰，以及他们对争论所保持的开放态度。

对格尔文团体的采访表明，该团体极为不愿杀害妇女和儿童。儿童十分弱小，会使人们对凶手产生极坏的印象，而妇女的“母亲”角色和“普遍性”使得杀戮妇女属于违背道义的行为（妇女不是父系的一部分，可以在家庭、部族和部落之间流动，因此具有普遍性）。格尔文人还表示，如果不实施行为约束，希望能够避免爆发无止境的纷争。值得注意的是，不愿杀害妇女并不排除实施性暴力。一位格尔文人于2017年1月说道：“我们晚上出去。如果抓到男人，我们就杀了他；如果抓到女人，就强奸她。然后她丈夫就会来打架。”以前人们认为强奸已婚妇女会遭受精神污染，继而增加在战斗中死亡的几率，对此的担忧有助于实施行为约束。但是，有些格尔文人重新解释了这一规范，认为可以强奸未婚妇女（常常仍然还是少女）。

64 Douglas H. Johnson, *Nuer Prophets: A History of Prophecy from the Upper Nile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94.

相比之下，在蒂特文团体中，2016年和2017年冲突中发生杀害妇女和儿童事件后，才出现了关于此举合法性的争论（2005年和2009年丁卡族内部埃普克部落与埃朱乌克部落之间发生争端时并没有出现这种罪行）。埃朱乌克部落的蒂特文人在一个黎明时分对牛群进行抢掠时杀死了两名儿童，从而引发了以牙还牙的报复，在几轮混战中有几名妇女和儿童被杀。努尔人和丁卡人都认为，长生不老是通过子孙后代得到保障的，因此杀害儿童（以及生育儿童的妇女）会带来永久和彻底的死亡。国家政客们在其家乡社区参加了讨论，有的支持实施约束，有的支持进行报复，特别是在争议牧场涉及他们自身利益时更加支持实施报复。许多酋长担心持续杀害儿童会毁灭和平希望，因此提倡实施约束。不幸的是，一个习惯法院案件未能解决这些杀戮问题在道德上的不确定性，未能终止纷争。

对戈贾姆团体的采访也反映出格尔文人在道德上憎恶杀害妇女和儿童的行为，他们认为妇女具有“普遍性”。过去，妇女是不受攻击的，因为进攻者可以与她们结婚。但是，2015年发生的袭击事件极其残暴，许多儿童遭到杀害和残害，这促使首领们把反对派团体中的妇女和儿童重新界定为“政府一派”，因而对待他们时不应进行约束。这包括任何居住在政府控制下有军队驻防城镇的人。一些努尔族先知不赞成这些重新解释，坚持应继续遵循传统信仰。有一个先知甚至把自己的家变为接纳西努尔各地儿童的避难所，不顾他们的政治背景而收留他们。然而，戈贾姆人及其社区对这种屠杀的合法性和精神危险的争论还在继续。如前所述，许多戈贾姆人感到，他们打破了太多禁忌而无法摆脱精神污染。

讨论行为约束规范的创造性方法

在南苏丹几个社区，摔跤比赛成为一种成人礼仪式。围绕摔跤进行热烈讨论，为介绍国际人道法概念提供了绝佳的机会。在给一个游牧团体提供急救培训时，一名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工作人员请几个青年解释摔跤比赛的规则。他们解释完后，培训人员又问谁有资格参与摔跤比赛，指着一位老妇人问是否可以和她摔跤。不出所料，小伙子们爆发出一阵嘲笑声并说道，妇女、老人和儿童非常柔弱，不能参加这项运动。然后，培训人员借此说明了这种情况与某些人员受武装冲突规则保护的共通之处。



5.6 研究意义

社区嵌入式武装团体仍然是其所在社区的一部分，可以成为一支强大的战斗力量。因此，地方、区域和国家当局，无论是在政治、社会、宗教还是经济层面，都可能竞相对何时和为何动员这种团体实施控制。了解这些相互竞争的当局和借以影响此类团体的当地信仰和传统，有助于确定潜在约束因素，包括当地宗教领袖和社会领袖，因为对外人而言，他们的影响力可能并非显而易见。实践证明，创新方法在加强行为约束规范方面十分有效。

牲畜疫苗接种、急救培训、医疗服务和家庭重聚等人道工作，使人道机构与许多对社区嵌入式武装团体的行为有影响的社区当局直接接触。如方框所示，这些工作可以作为跳板，用以探讨当地民众对暴力和约束及合法和非法目标的看法。关于如何在这些团体中加强行为约束规范和更好地尊重人道，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中教育程度不高的工作人员可能是最佳信息和分析来源。



研究意义 与接触方法

本报告表明，武装部队和武装团体在组织结构、指挥控制能力、社会化机制以及受对外部因素影响的程度方面存在很大差异。此外，武装部队与武装团体之间及其各自内部的暴力和行为约束模式也可能不同。研究还发现，团体的分权程度和社区嵌入程度越深，相互竞争对其施加影响的因素就越多。行为影响因素也随着时间的推移并根据不同事件而变化。这些发现表明，为确定影响武装团体选择实施暴力或克制的权威来源、信仰、传统和人员，首先应详细了解武装团体的内部运作方式。

对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来说，为深入了解武装团体，其本地员工和外籍雇员就需要采取多学科方法进行广泛参与，并使分析武装团体的责任民主化。不仅需要具有军事背景或受过谈判培训、与武装部队和武装团体进行对话的人员，经常还需要总务人员和开展供水系统修复、家畜疫苗接种、种子发放、恢复生计、建立诊所或传递红十字通信等项目的技术专家，因为他们经常与社区和武装团体沟通交流并建立信任。他们需要了解接触到的武装团体的性质，并为分析工作贡献他们的知识和经验。有关与武装团体接触的培训手册主要以理性参与者模式为基础，根据武装团体潜在的经济或政治利益来确定切入点。⁶⁵但本研究结论表明，行为也受价值观、传统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某种行为是否可接受也会在社区中进行讨论。要了解当地观点和价值观，首先应与社区本身进行更深层次的接触。

本研究揭示出的各种武装部队和武装团体之间的差异表明，对于促进他们遵守人道规则和原则而言，并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我们发现，组织结构会对武装部队和武装团体的行为影响因素产生影响。因此，本章根据每类武装团体的组织结构为其提出了一个“蓝图”，旨在指导人们思考针对每类团体适合采取何种方法。但我们首先将简要概述本研究的总体结论及其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其他人道机构的意义。

6.1 主要结论与意义

关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目前采用的“纳入法”

本研究发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采取的将行为约束规范纳入纵向组织结构的国家武装部队和非政府武装团体的方法仍十分切合实际。在国家武装部队中，提高训练强度并根据受众具体情况作出调整均有助于提升培训效果。在集权式非政府武装团体中，意识形态通过涵盖一切的社会化实践得以传播，意识形态及其传播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对行为产生影响，这表明为获得武装团体领导人对人道规范的承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采取的方法以及“日内瓦呼吁”⁶⁶仍具有实际意义。

⁶⁵ Gilles Carbonnier, *Humanitarian Economics: War, Disaster and the Global Aid Market*, Hurst, London, 2015, p. 20.

⁶⁶ 如欲详细了解该组织如何鼓励非政府武装团体签署遵守特定人道规范的《承诺契约》，可访问“日内瓦呼吁”网站：<https://genevacall.org/how-we-work/deed-of-commitment/>。

然而，研究还发现，同伴团体等非正式社会化过程能够像训练等正式机制那样对行为产生巨大影响，因而能够促进或阻碍对国际人道法的遵守。因此，为提升工作方法，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可以深入了解这些社会化过程并设法应对不符合正式规则的非正式守则和做法（如美化性暴力的行军歌）。

关于分权式武装团体和社区嵌入式武装团体的行为影响因素

虽然仅凭研究几个武装团体所得出的结论很难作出任何推断，但似乎显而易见的是，这些团体成员的行为并不像经常描述的那样混乱或失控；有明显影响其行为的因素；武装团体权力越分化，其外部影响因素就越多。马里和南苏丹的案例突出表明，在地方、区域和全球层面存在相互竞争的力量，均试图控制暴力的使用，而且均随时间并根据事件而发生变化。这为针对行为开展对话提供了更多切入点，但另一方面也削弱了任一因素对武装团体的影响。

过去十年中出现的许多武装团体联盟具有极其复杂的结构，如同“网络之网”，这要求应与那些在某一特定时期对暴力行为和实施约束产生影响的团体进行长期持续对话。促使武装团体成员对其使用暴力的行为产生怀疑，这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采用的促成行为逐步改变的一种做法。这种长期做法要求战略具有连贯性、组织制度具有延续性，以弥补短期员工更替造成的影响。

关于法律理由的首要地位

本研究 and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经验表明，对所有武装团体而言，在影响行为上，与仅注重法律相比，将法律与其背后的价值观相结合的效果更好。将法律与地方规范和价值观联系起来，使之更具说服力。法律在制定标准方面的作用至关重要，但通过社会化鼓励个人将法律所代表的价值观进行内化，可以更持久地促进行为约束。如果国际人道法规范是战斗员的荣誉之本，那么似乎不大可能发生相继违反国际人道法的恶性循环。因此，找到契合当地状况的历史或当代案例，能够更加有力地说明对行为实施约束的重要性。

关于了解武装团体

研究表明，武装团体的组织结构为了解其成员行为影响因素提供了重要线索。分析武装部队和武装团体的暴力模式，即实施暴力的类型、攻击目标、频次以及方法（见第一章），有助于了解指挥和控制问题，并确定在何时何处实施了行为克制。监测行为约束实例可以促进探究为何暴力行为能在一种环境中而非另一种环境中得到约束，这或许可以加深对产生影响的关系和参与方特性的认识。分清暴力是“政策”所致还是机会性的“惯例行为”，有助于确定应在何种级别开展对话。

以下问题可能有助于进一步了解武装部队或武装团体的组织结构：

- 1、是否明显存在发号施令的领导层？这些命令是否得到执行？
- 2、是否存在明显的等级和纪律标志，如制服、敬礼、整个团体级别使用具有一致性等？
- 3、该团体与当地社区的关系如何？是否获得社区（政治、社会或经济方面的）支持？

- 4、影响该团体的因素有哪些（政治、社会、经济、精神或其他影响因素）？他们如何施加影响？
- 5、该团体的意识形态是否反映在其实践中？
- 6、该团体的规则是如何在团体中得到社会化并得以加强的（如通过培训、仪式、有影响力人士的讲话、暴力行为等）？
- 7、该团体的下属单位是否拥有与该团体条令条例和所宣称宗旨相悖的仪式或实践吗？

并非任何武装团体都能恰好归入第一章武装团体组织类型范围图所示的某一类型。有些团体更类似于运动组织，核心团体是集权式结构，子团体是分权式结构，前者激发并指导后者的行动，两者之间隶属程度不一。分析这种联盟时，考察每一个成员团体的具体情况，有助于了解其实际自治程度。例如，所有成员团体的行为影响因素可能各不相同，因此需要在地方、国家、区域和全球等各个层面制定接触战略。

关于了解民间机构

前文研究的几个案例已涉及到社区在影响武装团体行为方面发挥的作用。居住在社区的平民并不是被动承受者，他们可以影响武装团体选择实施暴力或实施克制。在哥伦比亚，有些社区凝聚力强，拥有强有力的领导人，他们制定了保护自身免受武装暴力和侵害的自我保护策略。但是，社区也可能引发暴力。哥伦比亚和马里的社区都曾要求针对他们认为的危害商业利益者或不受欢迎者实施暴力。

加深与社区的沟通交流可以增进对约束机制的了解。在开展人道工作的过程中，有许多机会与社区成员就行为约束规范进行对话（见第五章有关摔跤的实例）。但是，人道组织在努力支持社区实施自我保护时，需要注意此举可能产生的后果。外来干预可以改变、甚至破坏社区态势；援助项目可能会引起武装团体的负面关注；支持社会团体的组织和主张本质上属于政治活动，可能有损人道组织的中立地位。

建立信任是开展接触的前提

人道组织与武装部队和武装团体接触并试图影响其行为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方对该组织宗旨和做法的信任。指挥官不太可能会见他们不信任的组织的代表，更不会听取其意见。理性主义者可能认为，与援助组织接触可能会为其控制地区带来商品和服务以及为其行动带来正当性，这比信任方面的考量更重要。⁶⁷对于冷战结束后二十年来的许多武装团体而言，情况可能确实如此。但是，过去十年来，由于缺乏安全“保障”和(或)“西方”人道组织活动遭到排斥等原因，援助组织进入非政府武装团体(和有些政府)控制地区的机会减少，表明环境正在发生变化。

本项目开展的一项调查有力体现了信任的重要性，调查对象是与非政府武装团体接触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工作人员。调查要求受访者回答，决定非政府武装团体控制地区是否接受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开展的人道行动的最重要因素是什么。51 %的受访者提到对该组织的原则和工作方法的信任问题(如中立、独立、保密性和可预测性)，只有21 %的受访者提及非政府武装团体的自身需求(如生活在其领地内民众所需的商品和服务、正当性、医疗物资、战斗员急救培训)。受访者强调，武装团体会郑重警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他们会观察该组织在当地以及其他地区是否言行一致。这表明需要在实践中和数字媒体上，进一步加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开展人道工作的一致性和连贯性。

6.2 接触蓝图

下面的“接触蓝图”针对每一类武装部队或武装团体，概述了主要研究结论以及制定接触方法时应思考的问题。它们构成了分析武装团体的切入点，但不能取代对其具体情况开展的细致背景研究。

⁶⁷ 如欲了解武装团体可以从哪些方面受益于人道行动，见：Fiona Terry, *Condemned to Repeat? The Paradox of Humanitarian Acti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Ithaca and London, 2002.



一体化国家武装部队 (第二章)

特 征

- 等级严格的决策和权力体系
- 一致适用的明文规则
- 明显的纪律标志 (制服、敬礼、例行工作具有专业性)
- 执行任务时与平民生活相分离

权威来源和行为约束因素

- 高级领导层
- 初级军官和士官
- 条令条例, 标准作战程序, 交战规则, 非正式规范和价值观
- 处罚威胁

社会化过程

- 正规训练、等级制度和纪律
- 非正式价值观和习惯 (如欺凌、行军歌)

结 论



国际人道法培训的强度 (频次、方法) 会对战场行为产生影响。培训人员的经验或专业知识必须让受众信服。



培训效果最好在类似战场的环境中进行检验。



应在关键节点由上级军官重申行为约束规范。



非正式社会化过程可以巩固或破坏正式社会化过程。



行为约束规范若内化为士兵身份的一部分 (从“这违反法律”上升到“这与我们的价值观不符”), 则更可能持续发挥作用。

考量因素



哪些重要事件或人物、个人特质和价值观形成了该武装部队的特征? 这些因素又如何影响正式和非正式社会化过程?



初级军官和士官对部队成员的行为和观点有多大影响?



武装部队成员有哪些双重身份 (如宗教、民族方面等)? 这些身份是否为促进行为约束提供其他切入口?



监督机制的作用是否随着与中央指挥部距离的增加而削弱? 这会对行为产生何种影响?



对于特定受众来说, 何种资质的培训人员最令人信服?

方 法



指导并协助将国际人道法纳入国内法律以及各项军事条令条例。



协助开发针对特定受众的国际人道法培训。寻找能引起参与者共鸣的案例。建议在压力环境中检验培训效果。



支持在组织文化中融入有关国际人道法的价值观, 以促进该价值观实现社会化。



跟踪暴力模式, 识别行为约束实例。研究影响行为约束的因素。分清实施暴力是政策所致还是惯例行为。



鼓励与其他国家部队和非政府武装团体结盟的国家, 确保其盟友在士兵或武装人员中实现行为约束规范的社会化。



集权式非政府武装团体 (第三章)

特 征

- 领导层通过严格的等级制度对下级行使严格的指挥和控制，但监督机制可能较弱
- 有明文条令条例规定或意识形态反映该团体的目标、方法和世界观
- 明显的纪律标志 (制服、敬礼、例行工作具有专业性)
- 与平民居民隔离 (驻扎在营地或军营中)

权威来源和行为约束因素

- 高级领导和下属部队指挥官
- 团体意识形态和行为守则
- 意识形态，行为守则，纪律规范
- 处罚威胁

社会化过程

- 全方位社会化机制 (如控制日常活动的各个方面)
- 加入仪式和非正式纽带

结 论



这类团体拥有列明组织目标的详细条令条例或意识形态。他们定期向公众公布或宣传该团体的理念和价值观。



这些规则规定了允许实施暴力的条件及对象。



监督作战部队行为的能力薄弱，使得部队指挥官可以自行解释并适用规范。



通过高强度社会化活动来重塑成员身份为目的，并以此培养成员组织忠诚度。

考量因素



该团体的意识形态是什么？其行为守则对暴力和约束有何规定？与国际人道法有何共通之处？



该团体的条令条例或意识形态由谁来阐述或解释？



该团体的信仰和规则如何在成员间实现社会化？



同一团体不同单位之间暴力模式是否不同？这说明指挥和控制具有哪些特点？



武装团体与当地社区之间存在何种关系？社区能否避免卷入冲突？



对于特定受众来说，何种资质的培训人员最令人信服？

方 法



跟踪暴力模式，识别行为约束实例。研究影响实现行为约束的因素。分清实施暴力是政策所致还是惯例行为。



讨论该团体条令条例与国际人道法之间的相似之处，并寻求进一步结合。



与领导层讨论规则与所发现行为之间的差异。对可导致规则出现不同解释的歧义提供建议。



与领导层讨论可能破坏正式规则的非正式规范及监督机制的作用。



与社区开展讨论，探讨如何与武装团体进行接触以及如何保护社区成员免遭暴力侵害和征募。



分权式非政府武装团体 (第四章)

特 征

- 不稳定的小型武装团体联盟
- 指挥官个人对团体成员拥有决策权
- 部队可能脱离联盟，加入新的联盟，但这并不损害团体凝聚力
- 多个分权式团体可合作开展更为广泛的运动，使其获得地方、区域和全球影响力
- 联盟内部协作并不密切，包括军事计划和行动协作
- 很少有迹象表明存在军事纪律

权威来源和行为约束因素

- 部队指挥官
- 当地商业、宗教或文化精英
- 高级领导层
- 意识形态和宗教经文
- 处罚威胁

社会化过程

- 形式极为多样
- 可能基于当地文化习俗
- 可能包括军事训练和意识形态培训
- 同伴团体中，非正式社会化过程影响力巨大

结 论



武装团体权力越分散，其行为受外部因素的影响就越大。



各部队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指挥官的行为取向。



团体融入当地社会网络(如社区、当地知名人士网络等)，并能够与区域或全球武装团体保持联系。



当地参与方对武装团体行为的影响随时间推移并根据不同事件而发生变化。



即使在没有监督系统的情况下，团体价值观和规则也能促进实现行为约束。

考量因素



武装团体联盟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小团体领导层与联盟领导层之间的关系属于何种性质？



武装团体与当地社区之间存在何种关系？社区领袖、商业领袖或宗教领袖是否会对武装团体的行为产生影响？



该团体是否采用基于当地习俗或传统(如成年仪式)的社会化过程？



武装团体主要人员的影响力如何随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变化原因是什么？影响因素有哪些(如宗教、经济、政治或社会等方面)？



作战习惯规则有哪些？与国际人道法有哪些相似之处？

方 法



跟踪暴力模式，识别行为约束实例。研究影响实现行为约束的因素。分清实施暴力是政策所致还是惯例行为。



优先考虑与当地指挥官开展对话。当地指挥官可能会经常变动。



详细了解影响武装团体行为的最重要因素，注意这些因素运用的权威类型。



接触策略需反映联盟的结构特征，在地方、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开展工作。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必须保证言行一致并具有可预测性和透明性。



社区嵌入式武装团体（第五章）

特 征

- 由来自当地社区的10至50名青年男子组成，有时成员中也有妇女
- 组成武装团体旨在保护社区利益
- 扁平型等级结构
- 由社区知名人士或政治人士动员而进行战斗
- 举行加入仪式促进形成团体凝聚力
- 动员活动具有暂时性
- 行为守则不成文，反映当地价值观、习惯法和传统

权威来源和行为约束因素

- 传统领袖
- 当地政治人物
- 当地宗教领袖
- 当地商业精英
- 当地青年武装人员领袖
- 社区规范和价值观
- 社区就规范解释问题所进行的讨论

社会化过程

- 社区成年仪式
- 当地宗教惯例和习惯做法

结 论



团体成员并非时刻保持动员状态，而是在没有战事时恢复社区成员角色。



社区嵌入式团体不能选择何时、何地或如何作战。



地方、区域和国家参与方可能会争夺对这些团体的影响力和控制权。



规定暴力和约束的传统规范可能会在社区中进行讨论。



这些团体实施的暴力行为混乱而不受控制，可能会掩盖这些团体的真正控制者。

考量因素



社区嵌入式武装团体是如何融入社区的？



团体领导人是如何产生的？他们的权威依据是什么？他们对团体直接影响有多大？



谁对团体何时和如何作战产生影响？



作战习惯规则有哪些？与国际人道法有哪些相似之处？



团体成员以社区成员身份行事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如何与其接触？我们能否在接触过程中间接讨论武装冲突中的行为？

方 法



跟踪暴力模式，识别行为约束实例。研究影响实现行为约束的因素。分清实施暴力是政策所致还是惯例行为。



进一步深入了解社区嵌入式团体与各类地方和国家权威人物的关联。



通过社区规范、习惯法或其他法律框架（如国际人道法和伊斯兰教法）促进实现行为约束。



采取跨部门的方法，了解社区并与其进行接触。

延伸阅读

Abu Hanieh, Hassan and Abu Rumman, Mohammad, *The “Islamic State” Organization: The Sunni Crisis and the Struggle of Global Jihadism*, Friedrich-Ebert-Stiftung Jordan & Iraq, Amman, 2015.

Al-Dawoody, Ahmed, “IHL and Islam: An overview”, *Humanitarian Law & Policy* [blog], 14 March 2017: <http://blogs.icrc.org/law-and-policy/2017/03/14/ihl-islam-overview/>

Atran, Scott, *Talking to the Enemy: Faith, Brotherhood and the (Un) making of Terrorists*, Ecco – An imprint of Harper Collins, New York, 2010.

Bangerter, Olivier, “The ICRC and Non-State Armed Groups”, *Exploring Criteria & Conditions for Engaging Armed Non-State Actors to Respect Humanitarian Law & Human Rights Law*, Conference Report, Geneva Call, Geneva, June 2007.

Bell, Andrew M., “Military Culture and Restraint Toward Civilians in War: Examining the Ugandan Civil wars”, *Security Studies*, Vol. 25, No. 3, 2016, pp. 488–518.

Bongard, Pascal and Somer, Jonathan, “Monitoring non-State actor compliance with humanitarian norms: A look at international mechanisms and the Geneva Call Deed of Commit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Vol. 93, No. 883, September 2011, pp. 673–706.

Bourke, Joanna, *An Intimate History of Killing: Face to Face Killing in Twentieth Century Warfare*, Granta Books, London, 1999.

Chiot, Daniel and McCauley, Clark, *Why Not Kill them All? The Logic and Prevention of Mass Political Murde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New Jersey, 2006.

Dickinson, Laura A., “Military lawyers on the battlefield: An empirical account of international law complianc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04, No. 1, 2010, pp. 1–28.

Geneva Academy, *Reaction to Norms: Armed Groups and the Protection of Civilians*, Policy Briefing No. 1, Geneva, January 2014.

Gutiérrez Sanín, Francisco and Giustozzi, Antonio, “Networks and armies: Structuring rebellion in Colombia and Afghanistan”, *Studies in Conflict & Terrorism*, Vol. 33, 2010, pp. 836–853.

Gutiérrez Sanín, Francisco and Wood, Elisabeth J., “Ideology in civil war: Instrumental adoption and beyond”,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51, No. 2, 2014, pp. 213–226.

Gutiérrez Sanín, Francisco and Wood, Elisabeth J., “What should we mean by ‘pattern of political violence’? Repertoire, targeting, frequency, and technique”,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 15, No. 1, March 2017, pp. 20–41.

Hoover Green, Amelia, "Learning Restraint: The Role of Political Education in Armed Group Behavior Toward Civilians", *Simons Papers in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No. 30, School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Vancouver, December 2013.

Hoover Green, Amelia, "The commander's dilemma: Creating and controlling armed group violenc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53, No. 5, September 2016, pp. 619–632.

Humphreys, Macarten and Weinstein, Jeremy M., "Handling and Manhandling Civilians in Civil Wa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00, No. 3, August 2006, pp. 429–447.

ICRC, "Spared from the Spear: Traditional Somali Behaviour in Warfare", ICRC Somalia Delegation, Nairobi, February 1998: <http://blogs.icrc.org/somalia/2015/09/21/spared-from-the-spear/>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Exploiting Disorder: al-Qaeda and the Islamic State*, Special Report No. 1/Jihad in Modern Conflict, 14 March 2016: <https://www.crisisgroup.org/global/exploiting-disorder-al-qaeda-and-islamic-state>

Jackson, Ashley, "Talking to the Other Side: Humanitarian Engagement with armed non-State actors", *HPG Policy Brief*, No. 47, ODI, London, June 2012.

Jo, Hyeran, *Compliant Rebels: Rebel Groups and International Law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2015.

Jowell, Marco, "Cohesion through socialization: Liberatio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in the forging of the Rwanda Defence Force (RDF)", *Journal of East African Studies*, Vol. 8, No. 2, 2014, pp. 278–293.

Kalyvas, Stathis N., *The Logic of Violence in Civil Wa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2006.

Kaplan, Oliver, "Nudging armed groups: How civilians transmit norms of protection", *Stabil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ecurity & Development*, Vol. 2, No. 3, 2013, pp. 1–18.

Maher, Shiraz, *Salafi-Jihadism: The History of an Ide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2016.

Manekin, Deborah, "Violence against civilians in the Second Intifada: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armed group structure on opportunistic violence",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46, No. 10, October 2013, pp. 1273–1300.

Marks, Zoe, "Sexual violence inside rebellion: Policies and perspectives of the Revolutionary United Front of Sierra Leone", *Civil Wars*, Vol. 15, No. 3, 2013, pp. 359–379.

Meijer, Roel (ed.), *Global Salafism: Islam's New Religious Movement*,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2009.

Mitton, Kieran, *Rebels in a Rotten State: Understanding Atrocity in the Sierra Leone Civil Wa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and New York, 2015.

Oppenheim, Ben and Weintraub, Michael, "Doctrine and violence: The impact of combatant training on civilian killings",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 Vol. 29, No. 6, 2017, pp. 1126–1148.

Parkinson, Sarah Elizabeth, "Organizing rebellion: Rethinking high-risk mobilization and social networks in wa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07, No. 3, August 2013, pp. 418–432.

Ron, James, "Savage restraint: Israel, Palestine and the dialectics of legal repression", *Social Problems*, Vol. 47, No. 4, November 2000, pp. 445–472.

Shapiro, Jacob N., *The Terrorist's Dilemma: Managing Violent Covert Organizati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New Jersey, 2013.

Siebold, Guy L., "The Essence of Military Group Cohesion", *Armed Forces & Society*, Vol. 33, No. 2, 2007, pp. 286–295.

Sinno, Abdulkader H., *Organizations at War in Afghanistan and Beyond*,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Ithaca and London, 2008.

Slim, Hugo, *Killing Civilians: Method, Madness and Morality in War*,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2008.

Staniland, Paul, *Networks of Rebellion: Explaining Insurgent Cohesion and Collaps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Ithaca and London, 2014.

Stanton, Jessica A., *Violence and Restraint in Civil War: Civilian Targeting in the Shadow of International La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2016.

Straus, Scott, "Retreating from the Brink: Theorizing Mass Violence and the Dynamics of Restraint",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 10, No. 2, June 2012, pp. 343–362.

Straus, Scott, *Making and Unmaking Nations: War, Leadership, and Genocide in Modern Afri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Ithaca and London, 2015.

Weinstein, Jeremy, *Inside Rebellion: The Politics of Insurgent Viole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2006.

Wood, Elisabeth J., "Armed groups and sexual violence: When is wartime rape rare?", *Politics & Society*, Vol. 37, No. 1, March 2009, pp. 131–161.

有关专题刊物

Engaging armed group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Vol. 93, No. 883, September 2011.

Generating respect for the law,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Vol. 96, No. 895/896, Autumn/Winter 2014.

Sexual violence in armed conflict,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Vol. 96, No. 894, Summer 2014.

Socialization and violenc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54, No. 5, September 2017.

Understanding armed groups and the applicable law,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Vol. 93, No. 882, June 2011.

War in citie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Vol. 98, No. 901, April 2016.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通常携手其红十字和红新月的合作伙伴，帮助世界各地受武装冲突和其他暴力影响之人，竭尽所能保护他们的生命与尊严，减轻他们的苦难。该组织还通过推广并加强人道法，捍卫普遍人道原则，来尽力防止苦难的发生。作为国际人道法的参考，该组织帮助发展这一法律体系，并努力加强该法的施行。

民众知道他们可以信赖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冲突地区开展一系列挽救生命的行动，其中包括：供应食物、安全饮用水、卫生设施和避难所；提供医疗救护；以及帮助减少地雷和未爆炸弹药带来的危险。该组织还帮助因冲突离散的家人重聚，并探视在押人员，确保他们得到妥善的待遇。该组织与社区紧密合作以理解并满足他们的需求，利用其相关经验和专业技术专长迅速、有效并公正地进行应对。



ICRC
官网



ICRC
电子资源库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东亚地区代表处

中国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9号

齐家园外交公寓3-2

邮编：100600

电话：+86 10 8532 3290

传真：+86 10 6532 0633

邮箱：bej_beijing@icrc.org www.icrc.org

© ICRC, 11.2018



ICRC